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4期 頁3-65
2011年9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特約邀稿

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

——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

許雪姬**

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戰後所修的臺灣人物傳，如《臺灣時人誌》（1947），《中華民國人事錄》（1953）、《臺灣名人集》（1953），《臺灣名人傳》（1953）、《南臺灣人物誌》（1957）等來觀察，發現戰後人物傳有去奴化、趨祖國化的書寫內容。如將日治時期參加皇民奉公會的事蹟削除，易之以日治、戰後熱愛祖國的事蹟。不僅如此，一些有偽政權經歷者，在傳中幾乎不呈現，使戰後臺灣人物傳出現了斷裂，以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三人為例，最能說明上述現象。

基於上述，如何解讀現成的臺灣人物傳，又如何評價臺灣人物，是當前臺

* 本文曾於2009年12月23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舉辦的「戰後臺灣社會與經濟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承臺灣師範大學吳文星教授提供修正意見；又本文承助理黃惟信先生蒐集資料，學生郎詠恩仔細校對，謹致謝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灣史研究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進一步說，臺灣人物的評價，不能依附於日、中，應有自己的立場。而日治時期在所謂偽政權工作的臺灣人，應與在重慶活動的臺灣人同樣被重視。

關鍵詞：臺灣人物評價、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

一、前言

人物傳記是記載史事一種非常重要的形式，中國自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纂修正史，莫不遵循此體例，將人物分類，類目略有增刪後，依序成傳。大致上人物可分為十多類，¹都是當代知名之正、負面人物，如循吏傳、酷吏傳、²貳臣傳，³其中以貳臣傳最能顯示後世為前世修史的強者之歷史解釋。在封建時代君臣之關係有其森嚴的界線，而服侍過兩姓的人則是大節有虧、臣道有損。

傳統的歷史，偏重政治、帝王的歷史，被視為「大人物歷史」，近年來文化、思想、社會史當道，關注小人物，注意文化現象、重視生活史，在小人物（廣義地說非菁英的歷史）上著力，和過去大異其趣。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的傳記，個人生平的釐清深化固然重要，然如何由這些人物傳中看出大環境、大潮流，更為重要。⁴

臺灣相關人物的傳記，歷來可由方志中的列傳而得窺一二，臺灣人真正進入清史稿列傳的只有兩人，一是王得祿，一是林文察。⁵清朝將臺灣割讓、臺灣進入日治時期，人物傳何時、如何編纂出版？這些跨越兩個時代的人物到了戰後又如何書寫？很顯然地，同一人，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其經歷會有不同的刪削增減。以臺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傳為例來加以說明，也許就可看出端倪。不論戰前、戰後，任何一本有關臺灣人傳記中，都不能少掉杜聰明。以日治臺灣人編的、年代最晚的《臺灣人士鑑》（1943）來

¹ 有后紀、宗王、大臣、循吏、酷吏、外戚、宦者、佞幸、儒林、文苑、忠義、隱逸、孝義、列女、方技等，大抵朝代較長類別較齊全，朝代短的或缺一、二類，或只有其半。見杜家驥，〈歷史人物傳記的史料價值〉，《歷史月刊》，115（1997年8月），頁32。

² 史記酷吏傳開其端，太史公自序曰：「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

³ 凡是侍奉二姓之臣稱為貳臣，以乾隆朝首開其端，清高宗於乾隆41年（1776）在國史增列貳臣傳，都載明臣降清者，清史列傳曾列出120多人的貳臣。

⁴ 王克文，〈人物傳記與近代史研究〉，《近代史學會通訊》5（1997年6月），頁39-51。

⁵ 《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三百五十、列傳一百三十七，《王得祿》，頁11257；卷四百二十九，列傳二百十六，林文察，頁12290。

說，除了他自1903年出生到1943年為止的醫學教育和教學履歷外，還有如下記載：

同〔昭和〕十六年七月皇民奉公會厚生委員 臺北州支部生活部長ヲ委囑サル。⁶

而戰後最早的臺灣人物傳，為章子惠⁷的《臺灣時人誌》（第一集）（以下省略第一集），不但沒提杜氏參與皇民奉公會，且加入如下敘述：

……得醫學博士學位，是時曾加入中華革命黨，鼓吹革命，旋任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教授。⁸

亦即描述他對中華民國早期革命的貢獻。再看1953年出版的《臺灣名人集》第一集，對其加入中華革命黨予以高度評價：

先生於清庭〔廷〕末造，民國肇始之時，曾加入中華革命黨，鼓吹革命，建立民國，其不世功勳，早存諸青史，以垂永久。⁹

編者認為加入黨就能名垂青史。1956年出版的《臺灣名人傳》的敘述就更為具體，出現他鼓吹革命、光復臺灣的事蹟：

杜氏雖然是一位醫學家，但是他的國家民族觀念非常濃厚，對於異族竊據臺灣，尤表憤慨，民國初年，曾和蔣渭水、翁俊明、劉兼善、邱鳳翔、李根盛、曾慶福等臺灣籍革命先進，組織「復元會」，企以醫術上的方便，鼓吹革命，光復臺灣，惜以言語關係，半途而廢，然而他的精

⁶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頁279。

⁷ 章子惠，福建永春人，1945年10月來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即省黨部）的訓練科代科長（後真除），兼主任幹事，1947年3月編輯出版《臺灣時人誌》，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該處，1946），頁278~279；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印，《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該室，1946），頁322。

⁸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第一集（臺北：國光出版社，1947），頁39。

⁹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第一集（臺北：新臺灣出版社，1953），頁28。

神是值得敬佩的。¹⁰

何以杜聰明在日治時的傳中，不但沒有參加任何革命的事蹟（如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反而是皇民奉公會的一員，戰後卻開始出現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反而不再提在皇民奉公會的事蹟。而他自己於1973年出版的《回憶錄》，就有一節特別講他如何和翁俊明兩人被推舉為暗殺袁世凱的代表，由準備到功敗垂成的經過。¹¹同一個人，即使跨越兩個時代，他的生命是一個連續而非斷裂的存在，但在戰前、戰後的傳中卻各有隱諱和補強之處，這是一個值得推敲的現象。而臺灣人中只有杜聰明的傳如此，還是大多數的人如此，更需追究，而這個集體（或個人）的現象，到底背後的因素為何？

至於戰前到戰後（日治到國府）¹²何以在1943年《臺灣人士鑑》列名的士紳，到了戰後1947年的《臺灣時人誌》大半即不再有傳，是編纂者有意的忽視，還是傳主的自我隱遁，不提供資料？這些落差，可見編纂者的挑選傳主，顯然在主客觀環境改變後有了重大的改變，那究竟如何理解其背後的意義？

人物傳到底是個人依凡例寫給編輯者，抑為編輯者根據搜集的資料編成；或傳主提供資料由編者撰寫？如果傳主以回憶錄、口述歷史方式來彰顯、膨脹、增減、辨證其生平事蹟以呼應時代，那麼我們在處理、研究臺灣人的傳記時要如何來解讀？¹³

又，人物傳是最容易由分類或評價達成某種目的最好的素材，偉人傳往往有砥礪後進的味道，民族英雄有凝聚族群認同、提振民族優越感的作用存在，因此我們要問，戰後臺灣人物傳的修撰有沒有去奴化（去日本化）、趨

¹⁰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臺北：商業新聞社，1956），頁39。

¹¹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1973），頁42-44。

¹² 指國民政府與行憲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的簡稱。

¹³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77。林衡道說：「部分投機的臺省人士則利用外省人士對臺灣真相的隔膜，誑稱自己是抗日英雄。其實真正的抗日者在光復後，很少提到以前反對日本人的歷史。」

祖國化的情形。

如果我們要詮釋人物傳的文本，除了由書寫的格式、書寫的內容加以分析，也不要忘記在表層書寫的背後，仍可以讀到其隱藏的含意，正如阿圖塞（Althusser, Louis）所提出的，所謂「徵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即用一種雙重閱讀的策略來了解在文本上沒有明言的深層訊息。¹⁴ 本文亦想採此一方式來解讀戰後人物傳。

黃英哲教授在其《「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一書中即探討二二八事件前臺人對外省人視本省人被奴化，有很大的反彈，如王白淵即曾為文反駁，而來自國民黨的統治高層不遺餘力地要剷除日本化（就是奴化）、之後再中國化，於是有了宣傳委員會與臺灣省編譯館的設立，在語文的轉化上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民間有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成立，不論是編譯館或臺灣文化協進會都不否認留在臺灣的日本學術文化。而國民黨省黨部則主張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來「黨化新臺灣」。¹⁵ 在臺灣文化重建的這兩年間，卻因發生二二八事件而使得去日本化、說國語、中國化成為不可挑戰的政治、學術、文化……無所不包的主流，臺灣人物傳是否也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書寫下？至於傳中的書寫如何去日本化，又如何再中國化？本文擬挑選出戰前、戰後較具代表性的傳做為例子來加以分析。

雖然已經有學者研究以提倡舊詩吟寫，組織詩社，做為戰後政府移植中華文化的媒介，¹⁶ 但本主題則尚未有人從事研究。本文擬以戰後各種不同年代、不同編者所編的人物傳，挑選數種做為分析的資料。擬先處理戰後人物傳的書寫，分析其特質，再就1943、1947年出版的《臺灣人士鑑》、《臺灣時人誌》加以比較，並舉出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三人的傳戰前、戰後的不

¹⁴ 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著、張君攻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臺北：巨流出版社，2001），頁169-179。

¹⁵ 許雪姬，〈評《臺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收於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頁288。

¹⁶ 廖振富，〈百年風騷，誰主浮沉？二十世紀臺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之對照觀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2009年10月），頁241、243。

同，來提醒讀者注意其傳（文本）中沒有明言的深層信息。

二、戰後臺灣人物傳的編纂

日治時期由《南部臺灣紳士錄》（1907）迄《臺灣人士鑑》（1943）這之中有明治期、大正期、昭和期的出版品，如《臺灣實業家名鑑》（1912）、《臺灣列紳傳》（1916）、《人文薈萃》（1921）、《臺灣人物評》（1929）、《臺灣官紳名鑑》（1932）、《台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1942）等書。大致上在凡例中可見其人物選取標準，內容的要素，索引編排等。可得出以下幾個小結論：人物傳中以官吏、會社經營者、醫生、律師、教師、府評、州市協、音樂家、文學家、美術家等人為對象，內容包括號（或原名）、出生年月日、籍貫、學歷、經歷、現職、興趣、著作、家族，日人編者皆用イロハ順。臺灣新民報社則使用五十音順，為方便讀者有地方索引別，尤其有內地、海外的人物索引，即在日本、中國及其他地方的臺灣人，但海外活動之人物所收仍不多。女性的傳很少，但《臺灣官紳年鑑》與《臺灣人士鑑》均有，其中以醫生、藝術家或對割讓之際有功者為限。人物傳剛開始，其編排不論臺、日人，都是先日人、後臺人分別編排，而後即混合處理，似可顯示內臺融合的一種表象。至於傳的內容，原本帶有評介、描述性質，後來愈制式化，如《臺灣紳士名錄》，只有職位和年代，條理清楚。傳中有部分描述傳主的興趣，對往後研究者提供了解該時代臺人生活史重要的線索。¹⁷此外，紀元都用日本紀年，但有例外即《臺灣列紳傳》保留前清的紀元，甚至用永曆不用康熙，顯示出編著鷹取田一郎的史觀，而臺灣總督府亦未干涉，似乎也顯示出大正民主的一端。至於傳中若有割讓之際効力日本的，則是重要事蹟必要登錄；而得勳章更不能少；至於參與臺灣民族運動，在日人所編的臺灣人傳中很少記載。臺灣左翼人士的傳絕少，大概只有黃師樵的《臺灣共產黨秘

¹⁷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155-165。

史》才有34個臺共的傳。¹⁸如上，日治時期的人物傳修撰已有一定的格式化，戰後情況如何？

戰後由於臺灣由中國接收，雖其過程發生弊病，但並未有軍事衝突，因此戰後雖仍百廢待舉，但臺灣人物傳的編纂工作並未拖很久，在1947年3月已出版《臺灣時人誌》（一），亦即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所有的資料都已就緒。這本戰後第一本人物傳到底與1943年出版的《臺灣人士鑑》有何異同？接下來陸續出版的人物傳，在格式、書寫有那些繼承自日治，又有那些做了改變？

（一）1947年《臺灣時人誌》（第一集）

作者為章子惠，當時服務於臺灣省黨部（即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後升主任幹事、¹⁹訓練科長。²⁰他原本被陳儀調來臺灣任某縣縣長，國民政府作業失誤才改派至省黨部服務，於1946年3月結婚，原本要爭取立法委員提名，但因妻子鄭玉麗投入國大代表選舉，章子惠乃放棄，撤銷資格。據說在省黨部時受到排斥，因此臺灣省主席魏道明於1947年5月上任後，就將章轉到省政府秘書處工作。²¹本書的編纂應是章氏在臺灣省黨部時期，他編這本書賺了77萬元，本要用來競選立委、國代之用，後只用在妻子的國代競選上。²²

本書所收的人物傳，採用發出〈臺灣時人誌人事調查表〉做為資料來源，其徵集的對象為「各機關高級人員、省縣市參議員、重要團體理監事、

¹⁸ 黃師樵，《臺灣共產黨秘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再版），頁1-54。

¹⁹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頁279。

²⁰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頁322。

²¹ 遲景德、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鄭玉麗女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0），頁160。唯查1947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職員通訊錄》、1947年臺灣省政府人事室編印的《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並未在秘書處找到其名。

²² 遲景德、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鄭玉麗女士訪談錄》，頁170；原來謝娥想選國大代表，但章子惠要其妻鄭玉麗選國代，故要謝娥改選立法委員。B-07-0001〈臺省國大卷〉，黃漢夫致李懷祖電：「查自國大代表謝娥因應省黨部組訓組長章子惠之妥協，願放棄國大競選，讓與章妻鄭玉麗後，即由黨部欲支持謝娥於最近出選立委以換代價。」本資料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各國駐臺外交人員，及社會、新聞、文化、商工、農林、醫藥、藝術、宗教、紳耆、婦女等諸領袖、專家、巨擘」。徵集的內容包括「學歷、經歷、事業、家庭概況、平日志趣或特殊技術等五大項，據其拳拳大者，提綱挈領，作一簡單有系統之敘述，全文勿超過三百字。」但編輯部對來稿有刪改權，應徵刊入本書的人，最少每人要預約一部，每部實收臺幣六百元，郵費加一；而截止日期在1946年11月，預計1947年1月出版。本書用十六開上等道林紙精印，全書400多頁，照片1,500張，文字50餘萬言，並請本省最高黨政首長題字。²³

以下用本書的凡例來檢證出書的實際情形，編者章子惠確實找到一些大人物來題字，如孫科、于右任、居正、王寵惠、陳果夫、吳鐵城、白崇禧、陳誠、彭學沛、馬超俊，其中以陳果夫的題辭較為貼切。²⁴

人名目次以姓氏筆畫多寡為序，此為日治以來，首次以姓氏筆畫為序的臺灣人物傳。至於編輯則和《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類似，放4吋大照片，姓名下放字、號，左為現職，接著為傳本身，先籍貫、次年紀、學歷，亦有興趣、家庭狀況，最後是現址與電話，分成三欄，共收1,003人（原訂1,500人），正文191頁，補遺有34頁（原預計400多頁），都未能達成目標。年代用民國，正如日治時代不用前清年代一樣。個人履歷大半沒有年代，對朝代交替之際，和新政府保持良好關係者，則被記入，如丁瑞彬，「本省光復後，即發起組織籌備會，歡迎祖國政府，維持地方秩序」；²⁵王隆遜，「本省光復時，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社會服務隊，以維持地方治安，設立三民塾，以教養地方青年，積極推行祖國文化」；²⁶丘念台「……卅三年奉 蔣總裁命，任直屬臺灣黨部執行委員，即聯絡閩、粵沿海陷區臺胞，籌劃會同盟軍登陸臺

²³ 〈臺灣時人誌人事調查表〉，嚴秀峰女士提供，謹致謝意。

²⁴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書前題詞，陳果夫題：「臺灣光復後，編此時人誌，人人得光榮」，陳誠的題辭也算貼切：「建設新土 群才輻湊 各奮其能 功靡不就」。馬超俊題「臺省勃興 風雲應運 蒼萃人文 群流仰鏡」。

²⁵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1，丁瑞彬。

²⁶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9，王隆遜。

島。及日寇投降，即奔走各省救濟臺胞，協助返鄉，至卅五年二月始飛返省境，重履光復之故鄉。旋於上年八月間組織臺灣光復致敬團，任該團顧問，率領團員林獻堂等十五人飛京、陝致敬、謁陵，以期打消內外隔閡，加強上下聯繫，為黨國奔走革命，數十年如一日。」²⁷ 上述抗日愛國事蹟，在日治時期於重慶服務的臺籍人士如李萬居、游彌堅等人的傳中特別明顯。

內容中也有一現象，就是將當時任職皇民奉公會與改姓名的紀錄都自動消除，如林呈祿，他在1943年的傳中有如下記載：「同（昭和）十六年四月皇民奉公會參與，同年六月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ヲ委囑セラシム，同年七月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トナリ，同十七年八月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ヲ委囑セラレテ現在ニ至ル。」²⁸ 到《臺灣時人誌》就變成：「……其間從事臺灣自治運動，凡二十六載，迨民國三十三年，歷年來所主持之唯一日刊民族新聞，竟被日當局強迫合併，因告停刊。」²⁹ 再舉林猶龍為例，1943年《臺灣人士鑑》載：「同（昭和）十六年五月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奉公委員，同年七月同大屯郡支會生活部長ニ夫々舉ケラレ今日ニ至ル。」³⁰ 到《臺灣時人誌》時則一語未及，而且將原來日治時期相當多的履歷予以減少。³¹ 郭一清醫生的例子，也值得一提。《臺灣時人誌》中將其日治時的經歷一筆不題，由光復後提起，而記「向為病家信賴，與同業擁戴」二句。³² 黃純青在臺灣割讓時與日軍聯絡，組織自衛團，維護治安之功，1923年皇太子來臺時，被選為教育功勞者；又在昭和即位時，得敘勳六等，還參加日本皇紀2600式典，³³ 在《臺灣時人誌》則無一語及。³⁴

將較多的婦女入傳，也是可以觀察的一個現象，本書不再在女性姓之後

27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10-11，丘念台。

28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325，林呈祿。

29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52，林呈祿。

3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65，林猶龍。

31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59，林猶龍。

32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112，郭一清。

33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55，黃純青。

34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220，黃純青。

加一氏；加上自中國大陸來的女性，取名不一定女性化，很難由姓名指認何者為女性（舉例言任培道，很容易被誤認為男性）。本書共有女性24人，大半是婦女會理事、理事長，或醫師、教職、文學家、護士。就籍貫來說，加拿大1人，外省籍有10人，本省人有13人。這些人從未見諸於日治時期任何一本名人傳中。何以當時將婦女會的經歷看得如此重要？可能這是省黨部的主要組織，且編者的夫人也擔任此職之故，否則臺人的女醫生、女教師不知凡幾，卻未能列入。不過能在1,003個傳中有24個婦女存在，也已超越日治時期臺灣人物傳的紀錄。

至於本書的人物傳有無經編者刪改，以目前可見的嚴秀峰的原稿來對照，大致保持原貌，但將民國廿六年、廿八年刪除，使本傳只出現兩個年代，又文中有「抗戰勝利後『即隨李友邦同志』來臺」，刪為「抗戰勝利後來臺。」又在傳的最後加入「對於本省婦運工作，貢獻殊多。」³⁵由此例可知，凡傳後所加評語，應是編輯加工所致。如蘇維銘傳中有「為人精幹，前途進展正無限量。」蘇惟梁傳中有「平日深研國史及臺灣教育，處事嚴謹，志節甚高。」³⁶

總而言之，本書尚具有一定的水平，不過，為適應情勢，將日治時期參加有關皇民奉公會及親日團體，或割讓之際協助日人的事蹟都予刪除，增加的是在日治時期的抗日事蹟，或協助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功績，或是半山在祖國的光榮作為。書寫的內容上，有時會有不必要的文學作品（如詩作），在邵祖敏的傳中錄其母為勗勉她所寫的五言詩；³⁷而對領袖如國父、蔣委員長都要空一格（如頁221，描述楊仲佐在光復後「受囑為 國父暨 蔣主席銅像籌備委員」）；外省人的傳來臺前的經歷太多，相比之下，本省人日治時期的事蹟較少；而不寫出生年月日而用幾歲來表示，增加推算的困擾與準確性，而大半的經歷沒有年代，也是本書較為退步之點。

³⁵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187，嚴秀峰。

³⁶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190，蘇惟梁。

³⁷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49，邵祖敏。

本書所收的人物有循私之嫌，如將年方24歲，沒有太多經歷的小舅子也放入，實非好現象，即將鄭建星入傳，相信擔任國光社經理也是他可以被立傳的原因。³⁸這在一般人物傳中較為少見。而在弁言附有編者的照片也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二) 1953年《臺灣名人集》第一集、《中華民國人事錄》

1.《臺灣名人集》：由序中知編者為臺人，在序中不免提國共鬥爭，國民黨撤退來臺後，「施建設、拔英才，推行民主政治，扶植工商發展，於是全臺俊傑之士，應時勢之需要，紛告脫穎而出，或勸助政府，或從事基政，或開發實業，或矢志教育，人才濟濟，極一時之盛。」但因未做有系統的記載，新臺灣出版社的同仁，乃費數年之籌備，多方採訪，共有「一百數十」人，「所記悉為其嘉言懿行，德政偉蹟。」同時怕有掛一漏萬之處，希望有增補的機會以出第二集。³⁹

本書共有167人，其的目次以姓氏筆畫為主，人物傳分上、下兩欄，上欄為照片，但照片若有從缺者，則兩欄皆傳。前附國父遺像，以霧峰林獻堂為首（時林在日本），其次為其次子林猶龍、三子林雲龍，如此排列是否以林獻堂為臺灣最重要的人物，很難臆測其真意，因林於1949年9月赴日後，早已脫離政治舞臺。以林獻堂的傳來看，即知其傳和往後的人物傳其精確度值得懷疑，如稱林獻堂有「神童」名，其父曾任廣東道臺（應是陳望曾），粵之老人至今猶有思之者，又說林獻堂「少從父遊宦客地」（林允卿曾中舉，但從未任實官，沒有宦遊之可能），⁴⁰但沒有提皇民奉公會，及戰後參加臺灣省光復致敬團，或二二八事件時的角色，更不用說寫下其已在1949年9

³⁸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一），頁223，鄭建星。且看其經歷：「本省新竹市人，現年二十四歲，日本大阪關西商業學校畢業，曾任共濟物產商營業主任三年，旋自營兄弟貿易行，嗣後投身新聞界，任臺灣商工經濟新報社臺北分社長，兼國光社經理。年青有為，發展無量，素長騎術，且迷於電影。太夫人健在，乃姐玉麗女士，現任省婦會理事，乃弟……。」

³⁹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序〉，《臺灣名人集》第一集。

⁴⁰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1，林獻堂。

月離臺赴日之事。傳記失真是本傳的缺點之一。至若誇大抗日事實亦令人難以接受。如說劉啟光被日人視為危險份子，數年之間，被捕下獄達十餘次之多；⁴¹又說陳逢源為日警逮捕，「置諸獄中，處以酷刑，而先生談笑自若。」⁴²此其缺點二。在傳記中既附照片，又對長相做不盡得體的描述，如描述林雲龍「方頭大耳，寬額隆準，兩目炯炯，神采奕奕，誠有富貴得而兼之之相也。」⁴³又說到澎湖人黃堯：「身材碩偉，骨格清逸，天庭飽滿，耳大及肩，蓄鬚，雙眸奕奕有神，清光四射，有透人肺腑之概，清貴之相耶！」⁴⁴由照片和常識都可知耳大不可能及肩，而蓄的是髭而非鬚，此其缺點三。第四種缺點用民前幾年來記出生年，徒令人困擾。如連震東，生於「民國紀元前八年」。⁴⁵第五種缺點則為行文沒有固定的格式，如陳啟清之傳提到其大名鼎鼎的父親陳中和，⁴⁶但連震東傳則不提其父連雅堂。⁴⁷第六種缺點，沒有女性的人物傳。缺點之七為，有時也放入非必要詩作，如宜蘭人張振茂隱退的詩，⁴⁸不甚得體。

本書亦有其優點，其一是多少提到二二八事件，如在楊肇嘉傳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時，在上海的楊肇嘉「既痛惜部分臺胞之輕舉妄為，後對於政府所未能因地因時制宜而有所措施者，亦作公平處理之建議，於是僕僕京滬道上，悉力疏陳，使中央彌增對臺省之認識，因得早日救平事變，先生之功著焉。」⁴⁹又如黃國書傳：「二二八事件，先生出任中部防禦司令兼宣慰使，撫慰民眾，救〔救〕平變亂，深獲中央嘉許，施〔地〕方稱頌。」⁵⁰其二是將

41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10，劉啟光。

42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11，陳逢源。

43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3，林猶龍。

44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5，黃堯。

45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7，連震東。

46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6，陳啟清。

47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7，連震東。

48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61。張振茂七言詩，說明其教育生涯「贊育菁莪已七年，三民主義自由天。逢時賦隱林泉裡，補讀殘篇枕石眠。……小覺今廢憶當年，光復新名喜着先。校礎重興培柱石，欣看後進繼先賢。」

49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9，楊肇嘉。

50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22，黃國書。

臺人的大陸經驗記載下來，如臺北人歐陽芳昌在1917年到廈門住六年，1925年回臺經商後，又離臺，曾至大連、瀋陽、天津，並赴大陸腹地，經營貿易，廣事交遊。⁵¹又如臺南人方文里，亦「潛返祖國」到上海經商，迭任日進公司、運送國策會社等大商業機構，負責商品輸入之工作。⁵²其三是登載擔任奉公會職務的事，如東勢人邱鳳池，傳中有「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任臺灣奉公醫師團臺中支部理事，奉公醫師團東勢分團長，成為東勢一地各科醫師之領袖人物。」⁵³這是戰後人物中唯一保留皇民奉公會職務者，不知係邱醫生本人寫的，還是編者編的？

2. 《中華民國人事錄》：這本人事錄收錄的人相當多，但索引卻僅限於姓氏筆劃頁數，未有姓名索引，使用者常覺不便。共469頁。本書選取的人為黨、政、軍、民意機關、工商組織、人民團體的現任負責人，主要做為「自由中國各機關團體連絡參考之用，不以此作為證明資歷或其他用途。」所刊的現職，是指1953年10月時的職務，若在付印時已有變動，則不再修改。人物傳的內容似為編纂委員會訪查而來，但似乎亦有徵稿，才有「為節省篇幅起見，對於較長之底稿，均略加緊縮」的字眼，合理的推測是由傳主提供，經編者刪削而成。人物傳中包含女性之傳，且在姓名下寫「女」字，以與男性區別，亦有人「僅願載其現職、職銜，故未列服務機關名稱。」⁵⁴

本書分三欄，不附照片，人名排在第一行，出頭一個字，名字下以較小字體附字或號。其體例為年齡、籍貫、學歷、經歷、現任、著作、⁵⁵宗教、

⁵¹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95，歐陽芳昌。

⁵²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101，方文里。

⁵³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臺灣名人集》（一），頁56，邱鳳池。

⁵⁴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編輯要點〉，《中華民國人事錄》（臺北：中國科學公司，1953），未載頁碼。據本書的廣告，中國科學公司設在臺北，經營圖書雜誌之進口及外銷業務，而在1953年3月要發行《中華科學畫報》，號稱自由中國唯一科學刊物。

⁵⁵ 如在地質學家林朝榮傳中即收錄七篇論文：〈熱河北栗炭田之層序及地質構造〉、〈竹頭崎油田之調查報告〉、〈臺灣之金礦床〉、〈臺灣新生代地層之層序研究〉、〈臺灣之金礦業〉、〈臺灣考古資料〉、〈臺灣瑞芳金山之地質及礦床〉；在法律學家洪遜欣的傳中收四篇論文（或書）：〈從法理之立場觀察裁判之効〔效〕力〉、〈現代民法之指導原理〉、〈法律與道德〉、〈法律之存在論的本質〉，教育學家孫邦正的著作更是琳琅滿目，還附上出版書局。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56、176、212-3。

⁵⁶興趣，⁵⁷視個人資歷資料多寡而定，但至少到現任為止。年代為民國、民前，但有不少人的經歷沒有出現年代，增加判讀的困難。有些大陸來臺人士，並沒有在臺履歷，也被收入。全書共收4,763人，是歷來人數最多的，其中外省籍男性3,402人，本省籍男性1,013人，外省籍女性295人，本省籍女性53人。由編輯要點可知大部分是黨、政、軍、民意機關、工商組織、人民團體之現任負責人。但若以本省籍男性、外省籍女性，或本省籍女性來看，絕大部分是民意代表。以外省籍女性來說，監察委員有13個、立法委員57個、國大代表有121個、縣市議員有18個、臨時省議會議員有1個，共有197個，其餘即為在大學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校長，總編輯。最令人注意的是黨團等人民團體，尤其是婦女會，由中可看見不少婦女團體，是否表示1953年以前女性社會活動相當蓬勃發展？其中有中國婦女福利互助社、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中國婦女政治研究會、中國婦女服務社，以及全國、省各縣市的婦女會。⁵⁸其次由東北帶來臺灣，由姜允中主導的萬國道德會，⁵⁹辦理幼稚園，亦值得注目。⁶⁰至於本省婦女，以各縣市議員及臨時省議會議員、醫生為多，其中有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推事邵祖敏，亦為臺南市市議員，⁶¹由日

⁵⁶ 在宗教方面記載信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人士，以佛教人士為多，如頁463即有出家比丘的傳：釋太滄、釋南亭、釋煮雲、釋慈航、釋演培、釋慧峰，而白聖、果哲、東初、達心都是，也有基督教的牧師如王守勇，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48、128、127、309，18-19。

⁵⁷ 如立法委員史宗周「對於中國文字學，甚有研究之興趣。」另一立法委員邢淑嬾，「愛好音樂、文學。」，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45、頁69。

⁵⁸ 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0，方志平；頁19，王竹祺、王金麟；頁46，包德明；頁461，羅毓鳳。

⁵⁹ 于初蘭，為萬國道德總會理事；苑潤蘭是萬國道德總會監事及附設立德托兒所所長；姜允中是萬國道德總會理事長，及臺北市私立立德幼稚園園長；薛善一，萬國道德會理事兼家政補習班主任。這是一個由東北籍人士所組成的團體。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4、160、164、435。

⁶⁰ 見羅久蓉訪問、丘慧君紀錄，《萬國道德會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又羅久蓉訪問、紀錄《姜允中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⁶¹ 48歲，臺南市人，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中央政治學校法官訓練班畢業，曾任四川重慶實驗地方法院檢察官，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推事，高雄地方法院推事、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推事，現任臺南市議員、臺南市婦女會理事，是日治臺灣婦女唯一學法的，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32。

本籍歸化的醫生黃貴美，她也是臺北縣縣議員。⁶²

本書和《臺灣時人誌》編的背景不同，在於後者在1947年，政府尚未遷來臺灣，並沒有大量的黨政軍官員來臺，因此本外省的比例還不太懸殊；但本書編於1953年，光是和政府一起來臺象徵法統的立法委員（後加上國大代表、監察委員）以及官員、軍事將領，就占有絕大的比例，以致於造成本書外省人多臺灣人兩倍的現象，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色。其次在履歷中曾經被選去就讀革命實踐研究院變成一個重要的履歷，因為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即有升官或成儲備人材的可能。另外，臺灣人的中國經驗，也予列入，和1943年的《臺灣人士鑑》相比，多出不少可供參考的資料，尤其一些非知名的半山或準半山。⁶³ 另為了配合當時的抗日氛圍，在一些臺灣人的傳中會加強敘述，進入私塾學國學幾年，或如何在日本統治時發揮民族精神不為日本所用，甚至戰後如何貼近祖國。⁶⁴ 當然我們不知每一個人物傳的形成是由作者提供的資料而成，還是由編輯改寫而成，抑或是經採訪後，參酌相關資料寫成，但是可以完全「體會」書中主人翁用心抗日、親近祖國的「努力」。如雲林人廖學義，畢業於臺北帝大農學部，主修園藝學，畢業於1937年。⁶⁵ 「因臺灣為日據時代，不屑踏進宦途，大學畢業後，辭退臺灣總督府之聘。」⁶⁶ 又如臺北縣人劉山溪，「富民族意識，時日人佔臺，氏目覩同胞痛遭凌辱，立志雪恥復仇，即私習國語文，擬潛返祖國，參加革命中興大業，因

⁶² 29歲，日本京都人，東京十佳高等女學校，東京女子醫專畢業後，和臺北縣人黃萬生結婚，1948年具呈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轉外交部經內政部核准取得中國國籍，1949年隨夫回臺，住臺北縣平溪，現任臺北縣第二屆縣議員，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36。

⁶³ 除一般所熟知的半山外，還有一些回自東北的「準半山」，如郭松根、張芳燮等，還有一些從未見過的，如李清標曾到甘肅岷縣、蘭州、新疆等地，如高國禧，畢業於中央軍官學校，曾任民政科長、陸軍第十軍政治指導員、軍事委員會參謀，國防部參謀，又如黃仲甫，曾任漳廈抗敵會專員、國防部組長。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14、209、329。

⁶⁴ 如徐金福「漢文私塾肄業七年」，如畢業於日本大學藝術系的呂訴上，完全沒有日治時期的履歷，但他的傳中有「曾排演臺灣歌仔戲『女匪幹』揭發共匪罪惡，及『延平王復國』暨『鑑湖女俠』，發揮民族與革命精神，又組織臺語劇團，演出反共劇『還我自由』。」見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21，徐金福；頁77，呂訴上。

⁶⁵ 臺大同學會編印，《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該會，1952），頁7。

⁶⁶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73，廖學義。

故而未果也，……逮臺省光復，即欣然參加國民黨為黨員，奉行主義，力行實踐。四十年奉調赴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期受訓。」⁶⁷

杜聰明在日治已是臺灣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收入本書時，其日治經歷幾乎完全刪除，只留下「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如果以1943年的《臺灣人士鑑》中的傳來比較，少了許多細節，但重要的關鍵可能在與「同十六年十月皇民奉公會厚生委員、臺北州支部生活部長ヲ委囑サル」一同刪除。而曾遭到戰犯審判，⁶⁸戰後任臺南市長的葉廷珪傳，日治時期只有學歷而沒有經歷。⁶⁹反觀往後在臺北擔任世亞盟主席的谷正綱，他的傳最長，幾乎占一頁的兩欄，說他反共的經過以及革命政治家的風格：

谷氏為中國反共陣營的中堅人物，三十年來堅持反共主張，奮鬥到底，三十七年徐蚌戰爭失敗後，文武高級人員，大多喪失信心，改變立場，向共匪乞和投降，主張蔣總統下野，氏獨於國家危疑震撼之際，力排眾議，堅持反共主張，並本政務官以政策為進退的精神，毅然辭去社會部部長職務，後倡寧為史可法，毋為洪承疇的警語，號召同志共起奮鬥到底，於退出內閣後，即赴上海與湯恩伯將軍共同保衛上海，直到最後戰敗始與湯將軍撤離，這充份表現了革命政治家的風格。⁷⁰

兩兩相比，不可以道理計。

又，在日治時期的傳，即使祖籍在中國，因時代氛圍也不再寫，但戰後有些人又要特別去強調祖籍，如丁瑞鈺，籍鹿港人，人所周知，⁷¹但在傳上

⁶⁷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98，劉山溪。

⁶⁸ 關於「案卷號1021葉山岩（葉廷珪）戰犯案。葉被捕，繫獄一年，最後不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改為「判決無罪」。

⁶⁹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54，葉廷珪。

⁷⁰ 谷正綱的傳鉅細靡遺，最後描述到臺灣後的他，「乃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黨政組組長，追隨蔣總統從事國民黨改造工作，現任常務委員，今後仍將本其堅定的信仰和一貫的主張，為反共復國而奮鬥。」見頁70-71。

⁷¹ 丁瑞鈺，《懷恩感舊錄》（臺北：自刊本，1986），頁5。乙未之役時全族曾回原籍，在抗日事變即重來鹿港。

寫「原籍福建泉州」；⁷²又如王慶基，出生在彰化，且畢業於臺南長老教中學（今臺南長榮中學），可以算是臺籍，但他的籍貫卻是福建廈門；⁷³其兄王慶勳，籍貫福建廈門，兩兄弟精於口琴，又能作曲，曲名為「領袖萬歲、反攻大陸、還我河山、國光三部曲、中華自由即興曲、海軍陸戰隊隊歌、我們是一群弟兄、金門戰士歌、克難英雄歌、聯歡舞曲。」可稱之為愛國作曲家或軍中作曲家。這兩兄弟戰時都在日本占領下的「北京」工作。⁷⁴

再，本書在編輯上有錯編之處，或重複之處，如兩位陳漢平，一本省、一外省，卻未編在一起，而是隔了二頁；⁷⁵又如陳鶴齡則是相同的人，卻在頁305、306都有傳；也有一人編成兩個，而內容還有點小不同，如伊西哪珍即國代吳香蘭，藏族人。在頁52有傳，但頁92又出現吳香蘭的傳，而前者的內容還多了「生長高原，長於騎射，篤信佛教，為一典型的邊疆婦女。」另如呂潤璧，因丈夫姓劉又以劉呂潤璧再出現一次。⁷⁶另外還有錯字，如周培智寫為周倍智，⁷⁷又如張瑞妍寫成溥瑞妍。⁷⁸

縱觀本書，雖然有些編輯的問題、書寫的問題，要之正能顯示出當時政治的氛圍，是研究當代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此處只舉三個例：一、戰後有營救第二次大戰臺籍戰俘運動，此為過去所未聽聞。⁷⁹二、有情治人員的履歷，如二二八事件時任臺灣警備總司令調查室南部諜報組長蔡蘭枝（化名謝愛吼），原來是情治人員出身，福建惠安人，還當過高雄市政府秘書，對高

⁷²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丁瑞缺。

⁷³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7，王慶基。

⁷⁴ 王慶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王慶勳則畢業於上海大廈大學；許雪姬訪問、紀錄，〈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2004年1月8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稿。

⁷⁵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99、301。

⁷⁶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77呂潤璧、頁403劉呂潤璧，完全相同。

⁷⁷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44，周倍智。

⁷⁸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69，溥瑞妍。

⁷⁹ 出現在陳登財傳中。臺北人，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畢（今臺北科技大學），又到新京工業大學（前身為新京工礦技術學院）攻讀一年，頁296。有關這段事蹟，無論是2000年接受本人訪問，或2005年接受楊麗祝、鄭麗玲的訪問都沒有提及。見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陳登財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氏所編，《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初版二刷），頁219-230；鄭麗玲、楊麗祝，《臺北工業生的回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9），頁97-104。

雄瞭如指掌，但在二二八事件的證辭上對死亡人數的報導有所偏差，⁸⁰ 也就不讓人意外了。三、收入原住民的傳。這是以往除南志信以外的新面孔，如王錫山、都明山、鄞秋天。⁸¹

(三) 1956年《臺灣名人傳》第一輯、《南臺灣人物誌》

1. 《臺灣名人傳》

和《中華民國人事錄》大異其趣的是《臺灣名人傳》的編輯，既以「臺灣」為名，只刊載少數的外省人父母官，獨立成一個系統，由臺灣人自己編。據「前言」，知編此書的目的，乃要讓後世之人了解在自由中國之中興大業中，臺灣人所擔負的角色。其收羅範圍「以臺灣朝野群賢為主」，直接採訪者附照片，有些用通訊搜集來的個人資料，往往沒有照片，編者認為「此為本書最大之缺憾」，其排列順序模仿大園市藏編的人物傳。書前以總統的照片和傳表崇敬之外，其餘均依姓氏筆畫多寡，以脫稿先後排列而不分職別。⁸² 由於人物傳資料搜集不易，採訪也困難，有時提供的資料太遲，在脫稿時尚未收到，因此每個出版社都有出第二輯的打算，《臺灣時人誌》、《臺灣名人集》都一樣，但和前者一樣，沒看到有第二集出現。

本書共收129人，比《臺灣名人集》167人還少38人。這兩本相差僅3年編成的傳，在人物的選取上有很大的不同，兩本都被選上的人物有王民寧、甘阿炎、李萬居、李建興、李建和、李卿雲（《臺灣名人傳》誤為李雲卿）、吳鴻森、吳三連、何傳、杜聰明、呂世明、林為恭、林雲龍、林生財、林鶴年、徐崇德、唐榮、陳尚文、陳啟清、陳逢源、陳萬、連震東、郭雨新、黃國書、黃朝琴、黃啟瑞、黃運金、楊請、蔣渭川、劉啟光、劉闊才、賴森

⁸⁰ 侯坤宏、許進發，《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國家安全局、臺灣省諮議會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頁232-233；〈二八、蔡蘭枝（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南部諜報組）「二二八事件」回憶資料〉（內政部警政署編印，1984年3月）。

⁸¹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162，南志信；頁39，王錫山；頁229，都明山；頁369，鄞秋天。

⁸² 商業新聞社，〈序〉，《臺灣名人傳》。

林、謝東閔、謝掙強、羅萬俔，共35人，在重要人物的選取上《臺灣名人傳》要來得客觀。

本書在書寫體例上名字加「先生」二字為敬稱，其次為字或號，籍貫有的細至鄉鎮；年代用民國紀元，以民國、民國前來表示，還好下附西洋年代，不過並非每個人都有出生年代。人物傳間有報導文學的寫法，由採訪所得殆無疑問，如李連春急公忘私的例子，⁸³還有的加上冗長的政見和政績，令人難以卒讀，如高雄縣議員朱萬成要競選第一屆臺灣省臨時議員時的政見，占該傳的1/3；⁸⁴又如第二屆省議員盧繼寶的提案，占了全傳的3/5，⁸⁵可見一斑。此外有的也介紹父母、妻、子女，如父親或兄弟是名人，但已過世的親人，也會在該人傳中補敘，如蔣渭川的傳中就有其兄蔣渭水的簡傳，占篇幅的1/4。⁸⁶

本書中絕大多數是臺灣人，但有極少數例外，大半是地方父母官，如澎湖縣長李玉林，河北灤縣人、花蓮縣長張文成，福建龍巖人，另為擔任縣政府主秘的林毓墀，福建龍溪人，基隆市長謝貫一，湖南新化人，⁸⁷縣議會（議長）的林永樑，出生在宜蘭，且其先祖早已遷居，仍冠上祖籍福建漳浦；⁸⁸在高雄從事教育工作的孫媽諒，「先世於一百年前移居臺灣，落籍高雄市」，仍寫祖籍福建晉江。⁸⁹戰後的人物傳，都不能免俗地，有人要將祖籍搬出來，不要說是其先祖來臺已歷日本50年統治，就是在清朝在該地居住20年即取得本籍，不料光復後復有此舉。再如戰後官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將

⁸³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7，李連春公務繁冗時則利用假日到各地巡視、辦公、開會，因而受民意代表質詢，如省議員劉金約就說：「你（指李氏）自己像暗光鳥（夜鷺）一樣，夜裡不要睡覺，但總要體念你的部屬需要休息才對，你不但半夜三更還在辦公室裡做事，而且老趁假日到各縣市去召集會議，弄得你的部屬都罵你破壞人家夫婦歡渡週末的好時光。」可見李連春急公忘私之一斑。

⁸⁴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2，朱萬成。

⁸⁵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92，盧繼寶。

⁸⁶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80，蔣渭川。

⁸⁷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20，李玉林；頁150，張文成；頁71，林毓墀；頁201，謝貫一。

⁸⁸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59，林永樑。

⁸⁹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95，孫媽諒。

高參的陳漢平，即使「先世隨鄭成功反清復明，轉戰臺灣，落籍高雄市。」他仍寫祖籍廣東省饒平縣，⁹⁰似乎不如此無以表示與祖國的淵源流長。本書129個傳主中，只有一位女性，游蘇鶯，是彰化縣選出來的臺灣省臨時議會第一屆省議員。⁹¹

雖然本書沒有明白說明何者能入選做為傳主，但經分析後，仍以省議員、縣議員、縣市長幾占80%以上為多，其餘為經商有成者或醫生，但不少人的身分是重疊的。本書也不能免俗的，舉出許許多多臺人日治時期在臺、在中國的抗日事蹟，半山或準半山自然都因為受日本壓迫而離臺，在臺者也飽受日本政府的壓迫，似乎不如此，無以說明傳主的熱愛祖國，也無以呼應當時的仇日氛圍。舉國民黨黨務人員張振生為例，說他「身為中華男兒，目睹斯狀，氣憤填膺，決志投奔祖國，獻身抗日，挽救危亡，乃於二十一歲時，……，潛逃祖籍福建省晉江縣，從事抗日復土、保衛地方之偉大任務。」⁹²1956年出版的本書，129個傳主中，全部都親歷二二八事件，但在傳中出現不多，僅有如下：

王民寧傳：「民國卅六年『二二八』事變時，襄助當局安定地方，厥功至偉。」⁹³

李源棧傳：「當臺灣發生『二二八』事變時，李氏住於左營，耳聞左營有暴動之企圖，乃及時鎮壓，妥善處理，終於化險為夷，現左營區軍民猶稱道不已。」⁹⁴

侯全成傳：「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本省一般盲從的同胞，發生震駭全國的事變時，侯氏以地方紳士的崇高聲望，在臺南地區挺身壓束，與民眾約法三章：一、不准打人，二、門口發現屍體者由戶主負責，三、見傷不救者罰。結果臺

⁹⁰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08，陳漢平。

⁹¹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71，游蘇鶯。

⁹²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47，張振生。

⁹³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4，王民寧。

⁹⁴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28，李源棧。

南秩序良好，沒有發生不幸事件。」⁹⁵

張振生傳：「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發生，張氏冒險掩護外省籍同胞，其對於事變之起源，認係共匪之一種統戰策略，企圖分化本、外省同胞之感情，進而打擊政府之信譽，張氏對部分臺灣同胞之盲目與妄為，猶遺憾不已。」⁹⁶

黃國書傳：「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受命赴新竹、臺中等地，勸導各該地區的盲從青年，叫他們安份守法，百端譬解，終使中部一帶歸於寧靜。其所表現的機智與才幹，尤為人所稱道。」⁹⁷

蔣渭川傳：「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變發生後，蔣氏四〔處〕奔走鎮壓，同時向行政長官陳儀忠言勸告，未被採納，反而引起誤會，致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此一意外事故，使他蟄居臺北縣達一年之久，幸經總統府資政丘念台的保證，獲得政府的諒解，才以自首投案的方法，撤銷通緝，宣告無罪。以後他即遞補為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⁹⁸

劉金約傳：「斯時，適逢臺灣發生不幸之『二二八』事變，一時成為混亂狀態，惟劉氏特能堅守崗位〔按：南投縣埔里山林管理所所長〕，對於保衛國家資源，不遺餘力，不分晝夜，親自巡護轄內山林，深獲省方讚賞，乃將劉氏調任農林廳技正，……。」⁹⁹

這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政府閉口不說二二八事件時，得由人物傳中可窺見事件之一斑，十分難得。可惜的是，在吳鴻森傳中，說到吳氏有 7 個弟

⁹⁵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79，侯全成。

⁹⁶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47，張振生。

⁹⁷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54，黃國書。

⁹⁸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80，蔣渭川。

⁹⁹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88，劉金約。

弟，除了「二弟在高等法院推事任內已經去世外」，¹⁰⁰並未明說其二弟為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於3月13日被捕，5天後屍體發現於南港橋下。¹⁰¹

2. 1956年《南臺灣人物誌》

此書由東南文化出版社印行，由吳巍主編，¹⁰²本書共收錄948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臺灣本地人，外省人只有15個。這15個外省人中，有的是議員、警察局分局長、縣議會主任秘書、漁市場主任、糖業公司旗尾廠廠長、水利會會長¹⁰³等與人民息息相關的主管。亦即，本書主要是以活躍於臺南縣以南的臺灣人物為介紹對象。人物的挑選標準為「為國家劬勞之地方首長，促進經濟建設之實業鉅子，地方篤農，工業先進，暨對國家社會有偉大貢獻之公司廠場人物」。¹⁰⁴實則仔細閱讀書中內容，所涵括的遠超過〈前言〉所提，除了編人物誌不能免俗的議員、縣市長、立委、監委、省府委員、國代外，¹⁰⁵以行業來說，有過去人物誌未收入、日治中後期不再允許開業的中醫師，此外有銀行從業人員、律師、醫生、記者、檢察官，工商界、菸酒配銷所、火車汽車站站長、農會漁會總幹事、旅社老闆、玻璃店、油漆、蜜餞業、公共茶室、布商、屠宰業、印刷業、市場、豆腐、刨冰、文具、藥劑、冰果、毛筆、烹飪、染坊、魚塢、棉被業、西裝界、鏡子、營造商、竹器店、算命仙、信用組合、土地代書、青果合作社、調解委員會、碾米廠、菸農、郵局、當舖等人員，到後來連村長、里長也都放入。這是以往或以後也難得看

¹⁰⁰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30，吳鴻森。

¹⁰¹ 吳鴻麒，〈吳鴻麒日記〉，3月13日以後由夫人楊喬治補記。

¹⁰² 依版權頁，主任委員為常本廣，常務委員為張群慕、洪再添，編輯委員為溫環雲、楊雲庄。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

¹⁰³ 見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60張承愈，頁61潘敦義，頁88陳德生，頁90王鎮南，頁128馬錫璿，頁183連德元，頁185杜士俊，頁205俞式，頁216黃道宜，頁249蔡劉雪英，頁255蔡曉峰，頁290黃一亞，頁306曲國高，頁310武義安，頁314殷其藻。

¹⁰⁴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前言〉。

¹⁰⁵ 如頁5陳恭炎、頁32朱上元、頁35陳登淨、頁36余宜壽、頁67黃應東、頁90趙江波、頁91陳教民、頁132陳子鶴、頁244余坤桔、頁259王庚申。見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

見各行各業的重要人物及其經營的情形。其中有一行業在60年代是重要行業，目前已經較少人從事的種菸工作，也可由此人物志中得到重要的資訊。如自日治時期就獲得「模範菸農」的林奎生，在戰後一直擔任高雄縣菸農代表及臺灣省菸農耕作改進社屏東分社理事。¹⁰⁶鍾煥熔，在1954年發明「噴油式菸葉乾燥機」，使他開設的建榮鐵工廠的業務更加鼎盛。¹⁰⁷此外，如公共茶室這個行業，也被記錄下來，安平人陳興旺，在戰後創南榮旅社，又創紐約公共茶室，曾任臺南市茶室公會監事二年，臺南市茶室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他在茶室中雇用韓國女性崔善玉，在1955年臺南市各界春節節約勞動捐募競賽大會中名列一等。¹⁰⁸

在948人中，男性占絕對多數這是正常現象，顯示當時婦女尚以家庭主婦為主，能出社會並出人頭地的並不多見，本書也有21個女性受介紹，以議員、醫生、婦女會理事、藥劑師、助產士為主，其中以議員最多。比較特別的是福建廈門籍的蔡劉雪英，¹⁰⁹她是唯一的外省人，任屏東東港國民學校教員、屏東縣議會議員。另一為沒有書明學歷，開創賣舊貨的和發商行，生意興隆還是高雄市舊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的陳車。當選理事長，也許和其夫陳登茂任高雄區舊貨商空瓶供應處主任委員有關，她被選上後，為會員的利益盡最大的努力。¹¹⁰《南臺灣人物誌》中只有一個原住民歸順義，住在屏東三地鄉，服務於南部山地教區特別山地事業實驗所，曾經在臺灣省行政鄉鎮訓練團第二期、省地方自治幹部訓練團第一期結業，曾任三地鄉鄉長、高雄縣議員。¹¹¹

陳車看來並沒有太多值得記載的事蹟，而本書竟有一些人和她一樣，並無可資記載的事，或現任已無職，也都被列入，如高再添，在日治時期曾擔

¹⁰⁶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01，林奎生。

¹⁰⁷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04-205，鍾煥熔。

¹⁰⁸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44-45，陳興旺。

¹⁰⁹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49，蔡劉雪英。

¹¹⁰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81-82，陳車。

¹¹¹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80，歸順義。

任岡山郡役所、彌陀庄役場職員30多年，戰後的事蹟是「對祖國的懷念至切，為文化教育，慷慨解囊捐輸巨款興學……」。¹¹²

對日治時期的事蹟，本書的介紹比他書來得詳細，如擔任像保正之類的職位，雖層次不高，亦是能出世的一種行業，因此本書也記載當保正的經歷，如徐雲祥任屏東麟洛長興庄第五保保正20年。¹¹³又如陳順和，屏東枋寮人，擔任保正10年。¹¹⁴

本書由於只限於臺南縣市以南人物，因此能多列一些地方人物，透露出許多有用的訊息，與本文有關的觀察有二：一是如何將臺灣人的抗日（如何受日人壓迫）的事蹟放入，二是如何做去奴化（去日本化）下的書寫。

（1）抗日事蹟：一般戰後人物傳會將臺灣人到大陸去，或者將起而參加民族運動，作為反日的實據。以整本書來說，持平描寫臺灣人戰前、戰後的生平是該書的特色，故這方面並未太過濫情。舉東港事件的受害者蕭永東為例：書中稱他「富於高度的國家民族觀念，在日據時代，為了不堪日人的壓迫，發動東港高等事件，抗拒日人的無理壓迫，轟動全島，寫下了臺灣人民抵抗日本的一頁光榮革命史，更為中華民族樹立磅礴的正氣。雖然，他有這樣偉大的貢獻，可是他不邀功，也不媚貴，這可以從蕭先生客廳裏自題詩句一首，可以見到他完美的人格，那便是：「調氣常平明志惟淡，守經勿滯用權得中」。¹¹⁵又如陳林石：「四十年前，他在日人的奴役統治下，曾作過多次不合作，與激發國家民族的運動，用以抵制日人，而名噪〔噪〕一時，成為當時抗日地下英雄之一」。¹¹⁶

（2）中國化的書寫：一如他本人物傳，特別記載早已無聯繫的祖籍，用中國紀元，特別是一般人難理解的民國前，傳中看不到擔任皇民奉公會、受勳，參加觀菊、觀櫻會的親日事蹟，本書也難以例外，舉例如下：如陳添

¹¹²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165-166，高再添。

¹¹³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80，徐雲祥。

¹¹⁴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304，陳順和。

¹¹⁵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50，蕭永東。

¹¹⁶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47，陳林石。

丁，在日治時期開的豆腐店叫「朝日」，戰後認為不妥，改為「建發」。¹¹⁷屏東縣人黃石頭，是個商人，「他愛國心很強，民族意識極深，昔日對於日人侵據臺灣，內心非常不滿，本省光復，給予他帶來無限歡懷與希望，因為他愛國，所以對軍人特別崇敬，感覺將士保國衛民堅苦奮鬥之偉大，因此，每次屏市的勞軍敬軍的壯舉，他都爭先恐後，踴躍參加，其愛國精神，可嘉可法。」¹¹⁸又如屏東火車站總務主任王萬發，他「因講得一口流利的標準國語，以是外省籍的朋友特別多，他十分嚮往祖國大陸河山，待反攻回去後，他常語人說：他將作第一個回大陸工作的人。」¹¹⁹再如曾有滿洲經驗的傅傳欽，「傅氏求學時候，寒窗苦讀於有中國生命線之稱的東北，學成後即入社會，乘工作之便，飽覽白山黑水之壯，日與大豆高粱〔梁〕為侶，在偉大的北國原野裡那可愛的風霜的磨厲中，他堅強的站立起來，這不但加深了他對祖國偉大的愛，且堅定了他為國効力的心，他的理想且終於在臺灣實現了，也是當今自由中國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工程人材。」¹²⁰

本書搜集不少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事蹟，以在廈門、¹²¹東北一帶為多。¹²²也有到廣東、香港、¹²³上海，甚至南洋一帶的，不贅。

本書上、下兩欄，大半附有二吋半身照，先敘籍貫、年齡、現址、學

¹¹⁷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50，陳添丁。

¹¹⁸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34，黃石頭。

¹¹⁹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37，王萬發。

¹²⁰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315，傅傳欽。

¹²¹ 如余宜壽曾在廈門開惠生診所；陳澤水畢業於廈門同文中學，曾任全閩日報社秘書、廈門民團書記，嗣營商至光復；周江到廈門開設開明洗染廠；許壇，曾被征赴廈門當通譯，1939年回臺。見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37余宜壽、頁42陳澤水、頁142周江、頁227許壇。

¹²² 陳振茂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藥學專門部；吳深池，曾任牡丹江都市建設局技手；梁松文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本書寫成瀋陽醫科大學，並在撫順創設天生醫院。〔按：創立者為梁宰，非梁松文〕；羅福嶽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亦在撫順天生醫院服務；日本大學醫科畢業的盧有智，曾任吉林寬仁醫院婦產科主任二年；趙啟昆畢業於瀋陽（奉天）鐵路學院機務系，於1948年在瀋陽中國長春鐵路局運務處運轉課任職時，曾計劃列車改善成功；傅雲欽長春（新京）工學院建築科畢業，曾任滿洲電業株式會社工務部建築科職員，東北電業總局土建課設備股長；梁炳元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擔任撫順新生醫院院長。見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8陳振茂、頁16吳深池、頁100梁松文、頁100-101羅福嶽、頁132盧有智、頁291趙啟昆、頁315傅雲欽、頁320梁炳元。

¹²³ 曾添福畢業於汕頭的美術專科學校；李雲龍畢業於廣東省立工業專門學校，曾在廣州市源泰公司服務；蔡朝實曾在石原產業株式會社海南田獨礦山工作。見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55曾添福、頁79李雲龍、頁85蔡朝實。

歷、經歷、家庭與興趣，以採訪得來的資料為多，內容有不少錯誤，難以盡舉。不能免俗地，本書書前有國父遺囑、總統玉照，接著是各重要首長的題字，如行政院長俞鴻鈞、臺灣省政府主席嚴家淦，到第12頁忽然有出現兩位法律人黃演渥、張有忠的題字，到頁323，有「南臺灣名勝介紹」，包括開元寺、延平郡王祠、舊超峰寺、新超峰寺、立德寺、法華寺、福全堂、龍湖庵，最後介紹彰化銀行的三巨頭，標題為「強國裕民歷史輝煌的彰銀現任三巨頭簡介」。相信本書的編輯費，除了20頁的廣告費外，彰化銀行應也多所資助。

這本書最為人詬病的是他的目錄，毫無秩序可言，其編排原則，據筆者的體會，即前半人物的位階較高，越到後來以里長、村長、鄉民代表等為多。雖有如上缺點，但本書對研究南部地區的大、小人物，所從事的行業，都有相當重要的報導，是研究臺灣南部不能不參考的一本書。

（四）1957年《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

本書共收錄256人，其中臺灣人91位，外省人165人，沒有任何一名女性。編排為每人一頁，全欄位，但由於字數不同，因而內容多的就用小字，內容少的就用大字。如頁34，林柏齡約1,000字（包括照片），又如頁160陳紫楓傳約750字（包括照片），因此版面看起來很不齊整。至於人物的敘述，先字號、籍貫、生年、學歷、經歷，特別是和商工業有關的經歷。本出版社已在1952年出版過《中國當代名人傳》及《自由中國名人傳》第一、二集，共三巨冊，頗獲好評，但也許上述較注重黨政軍教各界領導人物，較少觸及一般財經兩界的領袖及實業鉅子，所以這本傳乃為介紹及表揚工商企業界人士為主體。採取提供稿件的方式來成書，由於本書出版前尚有稿件未到，期望能收入第五集¹²⁴（但未見有第五集問世）。

¹²⁴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序〉，《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臺北：世界文化服務社，1957），書前無頁數。

本書最大的問題在於明白標舉「工商企業界人士」，理當都是這類人士，但我們若一一檢視，就可以看出，不少人非工商界人士卻放入，這是編人物傳時難以嚴守凡例的現象。以下舉例說明列入某些人物之不當，如王洛，他是醫生，且是時「正赴美國研究公共衛生中」；李玉林（目錄誤為李玉琳）是澎湖縣長；吳錫澤是國民大會代表、臺灣省新聞處處長；吳景徽雲林縣縣長、醫生；何志浩為聯勤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杜聰明教授、臺灣省政府委員；谷正綱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主席，為政治家；林熊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洪蘭友國民大會秘書長；馬星野國民大會代表、報人；袁守謙交通部部長；梁上棟監察院副院長；梁寒操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梅可望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連震東臺灣省民政廳廳長；郭驥國民大會代表；黃國書立法院副院長；黃啟瑞臺北市議會議長；曾虛白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傅雲臺灣省社會處處長；端木愷律師、立法委員；覃勤立法委員；趙琛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雷法章銓敘部長；劉真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鄭品聰立法委員；樂幹臺灣警察學校校長；錢思亮臺灣大學校長；錢壽恒總統府參軍；謝冠生司法院副院長；謝東閔教育廳副廳長；謝貫一基隆市長；謝掙強高雄市長；顏春輝衛生處處長；關吉玉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由以上即可知本書在人選的選取上有不少瑕疵。¹²⁵

其次由本書的編纂脈絡來看，人事傳中出現大量黨職的記載，充分顯示出當時以黨治國、黨國一體的本色，甚至黨凌駕於國。以上述不是工商界確是名人的傳為例，如馬星野，他任中央日報社社長，一直到1953年改組才辭社長而改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到1954年「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¹²⁶又如工商界人士，任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的經

¹²⁵ 見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22王洛；頁38李玉琳；頁49吳錫澤；頁55吳景徽；頁62柯志浩；頁68杜聰明；頁74谷正綱；頁92林熊祥；頁103洪蘭友；頁118馬星野；頁133袁守謙；頁135梁上棟；頁136梁寒操；頁145梅可望；頁146連震東；頁149郭驥；頁180黃國書；頁182黃啟瑞；頁191曾虛白；頁197傅雲；頁198端木愷；頁199覃勤；頁209趙琛；頁218雷法章；頁218劉真；頁228鄭品聰；頁232樂幹；頁233錢思亮；頁235錢壽恒；頁238謝冠生；頁239謝東閔；頁241謝貫一；頁243謝掙強；頁247顏春輝；頁249關吉玉。

¹²⁶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118，馬星野。

理施復昌，他「前在中國國民黨改造期間，先生曾奉派為中華航業海員黨部改造委員，及改造完成後，又當選為第二屆主任委員，對於組訓黨員，激勵忠貞，建樹殊多。」¹²⁷反觀本省籍人士，描述黨職的人不多，（但臺灣人91人中，大概都是黨員）可以推測，一者黨職不高，沒有寫的的必要，一者即便有黨職，不論高低也沒有實權，因而選擇不書寫。當時半山中除黃國書位高任立法院副院長外，¹²⁸連震東兼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算是較高的職位，因此在傳中出現。¹²⁹

本書就本省籍人士的抗日事蹟，已經較少敘及，但亦可舉一二，如任臺北市議會議員、大亞影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錫洋的傳：「前於日據時期，表面為一商界人物，擔任臺北州興行公司主管，……，實際上則督率青年從事秘密抗日運動。」¹³⁰擔任省政府顧問的許丙，「……三十歲即當選市〔按：會〕議員，三十五歲為州〔會〕議員，四十歲為總督府評議員。其間不避日人凶焰，反對改姓名、廢寺廟，為臺民爭取利益，以是聲譽鵲起。……雖在日據時期，亦埋首鑽研祖國文化，力主修建孔廟、保存寺院，始終不更用日人姓名。……」¹³¹對戰後臺人的心向祖國，亦僅在特殊人物上敘述，任內政部常務次長蔣渭川的傳中有如下描述：

……曾在臺北太平町開設「三民」書局，當臺灣光復之第八日，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即首先飄揚于三民書局門前，而經常出沒於此一書局之青年人士，亦均變為街頭教唱國歌之導師，暨監視御用士紳醞釀獨立之偵探。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在臺北中山堂召開三民主義宣傳大會，任主席者，即先生也。¹³²

¹²⁷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110，施復昌。

¹²⁸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180，黃國書。

¹²⁹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146，連震東。

¹³⁰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58，吳錫洋。原文誤將臺北州植為中北州。

¹³¹ 卜幼夫，《台灣風雲人物》（臺北：新聞天地社，1962），頁124，許丙；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155，許丙。

¹³²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217，蔣渭川。

總之本書雖然在編纂上有其嚴重的缺失，即放入一些非工商界人士的政治人物，但在人物傳的敘述中肯，對臺人的抗日，或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表示的熱烈歡迎，這類政治性的語彙漸少，不過卻又在某些有在汪政權、滿洲國的相關經驗，甚或戰後曾涉入「臺灣自治案」（或稱臺灣獨立案者）都予「肅清」，也令人相當遺憾。只舉簡單的一例來說，許丙、林熊祥的涉入「臺灣自治案」，但是兩人的傳中均沒有這一記載，也許這是傳主本身不願再提起此事也說不定，而不用責怪編者或出版社。這種「履歷消失」的現象，其背後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當時尚未解嚴，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將人生中不必出現以增加自己困擾的經歷予以刪除，這也是臺灣人的一種莫可奈何的保全之道，但引用此傳者，不能不注意此一現象。

（五）1962年《台灣風雲人物》

卜幼夫所採訪撰寫的《台灣風雲人物》共收集64個臺灣人的傳，其中沒有女性。先是1955年在其兄、《新聞天地》創辦人卜少夫之鼓勵，他以「臺灣人物誌」為題在《新聞天地》寫專欄，到1957年先後寫了40篇，這時有讀者去信希望能結集成書，但因只有40人恐未能做為臺灣人物的代表而未出版。一直到1960年，卜少夫要他將已過世或判刑的人刪除；將1957年以後人物志中人物職位的變遷予以追加；潤飾文字，再增加二、三十人，他才決定付諸實行。受命後，他於1961年12月開始進行此事。¹³³ 出版此書，有兩個意義，一要海內外人士了解到臺灣傑出人才的經歷與現況，二要表揚、鼓勵這些被選的人物，曾對國家有貢獻，未來也必然會在復國、建國上盡其國民天職者。但是，這本書以速寫的方式來處理人物傳，亦即為卜幼夫個人的「人物印象記」，因此「將它當作傳記來看，那是不夠深刻與詳盡的」。¹³⁴ 其實出這本書主要是希望臺灣同胞支援反共像四川同胞支援抗日一樣，負起這個時

¹³³ 卜少夫，〈跋〉，《台灣風雲人物》，頁224-225。

¹³⁴ 卜少夫，〈序〉，《台灣風雲人物》，頁2-3。卜少夫在序的前段還修理了以前的好友，時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的李純青。

代的責任使命，而這64個人物是在這樣的期許下被選出來。

這本書在此原則下選取的人物，當然以抗日期間在重慶陪同國民黨政府一起抗戰的半山，以及當時臺灣人中的立委、國代、監委、省議員、縣市議員、縣市長以及醫生、教授、工商界這類人物為主，和《南臺灣人物誌》所呈現的包括中、下階層的臺灣人大異其趣。他所選取的臺人中，有35人和《臺灣名人傳》重複。在撰寫的風格上，是以側面，甚至批評、揶揄的語調來書寫。每人的傳長短不一，大抵3-4頁最多。但也有超過的，大致上在敘明其人的政績、政壇浮沉或精彩的經歷，如高玉樹由他如何和國民黨人士競爭臺北市長的寶座說起，再說他在臺北市長任內的「無以表現」，以葉一明事件、黃千里事件為例，寫了5頁多。¹³⁵黃國書的傳有4頁多，大致在說他在中國大陸的豐功偉績，又如何登上立法院長的寶座。¹³⁶黃啟瑞有5頁多，描述黨如何栽培黃啟瑞，以及在臺北市長任內發生的弊端。¹³⁷彭瑞鷺5頁，將他在新竹縣長任內的功績寫了3頁多。¹³⁸謝成源6頁，可說最長的傳，這位在鳳梨業上頗有嶄獲的貿易商，是卜幼夫很有興趣的對象。¹³⁹

由於這本書反共、反日的調性很強，因此對於臺籍人士的抗日就相當花功夫來描寫，半山人士因反日而到祖國去革命、去讀書、去經商的，屢見不鮮，此處不再多論，僅以無中國經驗的臺灣人的傳來。如牽涉入「支那間諜案」的李建興，1939年8月事件爆發時，日本人「一口氣無故逮捕了善良的台胞一萬餘人……，他的弟弟李建炎，長婿黃羿淮，暨員工等四十一人，經不起酷刑的折磨，全部慘死獄中，他的老父亦因此激憤而死。」¹⁴⁰頗有誇大其辭之處。林柏壽傳中則指出「林氏自幼即有愛國思想，故早年便流亡內地。」他出生於1895年，乙未臺灣割日，其父林維源帶著他和兄弟、家人到

¹³⁵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79-84，高玉樹。

¹³⁶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32-136，黃國書。

¹³⁷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40-146，黃啟瑞。

¹³⁸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66-170，彭瑞鷺。

¹³⁹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05-210，謝成源。

¹⁴⁰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4，李建興。

廈門去了，所以早年「流亡內地」非自由意志。¹⁴¹唐榮以15歲（1881年生）在1895年來到臺灣「當他剛剛上陸後，即被日軍強拉，抓去當軍伕，專門挑軍糧彈藥，可憐他發育未全的身軀，經不起日以繼夜的折磨，羅〔罹〕致重病，才僥倖被放走，重獲自由之身。」¹⁴²這是很容易說明日本人暴虐的故事。馬有岳在日治時期結合6個友人組成「六振會」，而且還代表臺人根據「匪徒刑罰令」控告日本移民霸占臺人的土地，雖經判定緩起訴，但移民已有顧慮而收斂。¹⁴³更戲劇化的是，在藝術家陳清汾的傳中描述他第一次到東北，忽然間聽到砲聲「原來就是九一八開端」，因他親眼看到日本侵略我國的事實，使他「熱血沸騰，奮〔憤〕恨填膺」，於是雖然回到臺灣，雖然雙親在堂，他卻顧不得又到海外去了。¹⁴⁴將陳清汾遠赴海外和抗日拉上關係。張祥傳原任臺北州海山郡土城庄助役，「惟以日本人專橫高壓，這位年輕小伙子，有著濃厚的民族思想及國家觀念，自然深表不滿，他終於決定掛冠求去，全力經商。」¹⁴⁵在辜振甫傳中提起其父辜顯榮，不但沒有說他是賣臺的「漢奸」，反而說他「興建台北孔子廟、龍山寺、台中市第一中學及台南圖書館，竭力維護我國固有之文化道德，其行誼風範，蜚聲鄉梓，飲譽一時，值得後人効〔效〕發〔法〕。」¹⁴⁶謝文程的傳中，為我們提供了他抗日線索，「由於他具有高度的國家民族意識，致不願接受長期的被奴役，日據時代從事民族運動，朝夕奔走，始終不懈，其對當時反殖民地統治運動，功不可沒。」¹⁴⁷但翻遍抗日運動史的相關資料中，卻看不見有謝文程其人。

在二二八事件上，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場，贊許黃國書、鄒清之、¹⁴⁸華清

¹⁴¹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46，林柏壽。

¹⁴²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89，唐榮。

¹⁴³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92，馬有岳。

¹⁴⁴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17，陳清汾。

¹⁴⁵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30，張祥傳。

¹⁴⁶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78，辜振甫。

¹⁴⁷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11，謝文程。

¹⁴⁸ 黃國書單槍匹馬到臺中安撫，他在途中幾為流彈所中，改裝前進，終於到達新竹、臺中，與誤信浮言之武裝青年群眾懇談，才使中部一帶滴血未流。這樣的描述，稍嫌誇大。鄒清之則奉命到新竹地區，車過新莊被當地青年逮捕，押解至鎮公所，正在危急時，一位曾被他協助返鄉的青年救了他，遂能安然回臺北，並奉派接替新竹縣長。見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35、

吉（原住民）等人協助政府的貢獻，其中尤以華清吉（原住民）最值得介紹，¹⁴⁹ 反倒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無一語及之，僅說他「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成為震驚全國的新聞人物」，¹⁵⁰ 令人意猶未盡。

本書在描述人物完全以報導文學的方式，以「忠黨愛國」做為時時用來量度臺人的尺，對即將組黨的「中國民主黨」似乎不表贊成，對戰後初期，高度自治那就更不在話下。在蔣渭川的傳中提到1949年中央政府要遷臺時，大約有16名本省高階層的領導人想要高度自治，參與其事，實際上是受到美國駐華代辦師樞安（政府遷臺後美國駐中國第一任外交代表）背後慫恿，但師問到蔣渭川時，他拒絕面談。蔣後來不得不去開會時，就大力反駁師樞安說國民政府已失民心，沒有希望，臺灣人自己應該獨立的說辭，因而不歡而散，而此組織也告流產。¹⁵¹ 對雷震等人要組黨，也語盡揶揄，如李萬居的《公論報》被張祥傳奪走之事，作者說《公論報》是李萬居的政治資本，「何況，李萬居是醞釀已久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的核心首腦之一，（內定的組織部長）他怎會輕易放棄公論報呢」。¹⁵² 又如吳三連傳中，稱他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夾縫中的人物，特別是前年反對黨（中國民主黨）呼之欲出之初，吳氏面臨著重大的考驗，經過再四考慮，他選擇了周遊列國一途，名義上是赴美為其子主持婚禮，實際上是躲避現實所給予的煩惱。」¹⁵³ 從如上的描述，卜幼夫對臺人高度自治、組反對黨不抱好感！

書中以不抱地域觀念，不分本、外省人的臺灣人做為讚美的對象，如對許金德任工礦公司董事後，該公司7個外省主管中，只換了一人，力主打消本、外省人間的隔閡，而其秘書、總務兩處均為外省人。¹⁵⁴ 又說臺北市長黃

頁186。

¹⁴⁹ 華清吉勸正要下山援助漢人的原住民，先觀望三天，於是南部國軍增援，彭孟緝出兵鎮壓，乃得以成功，他因此而被彭孟緝頒獎，隔年六月即當選省參議員。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77。

¹⁵⁰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91，蔣渭川。

¹⁵¹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93，蔣渭川。

¹⁵²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3，李萬居。

¹⁵³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30，吳三連。

¹⁵⁴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28-129，許金德。

啟瑞是一個「沒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界限劃分，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地方。」¹⁵⁵作者讚許彭德是「台灣人中思想比較開明的一個，地域觀念遠較一般人為淺。……太太是上海人……。」¹⁵⁶更贊揚蔣渭川如何消除本、外省人間的隔閡。¹⁵⁷不僅如此，書中也批評傳主的親日色彩，說李連春「親日色彩太濃，處處以日本人為標榜。」¹⁵⁸吳三連不像羅萬俔一樣留學美國，受的是日本教育，使吳三連「侷促在台灣與日本之間」。¹⁵⁹對許丙更是大加批評，說他是「一個過了時的紳士，對日本帝國並不忘情的政客」、「思想和時代潮流有一段很遠的距離，何況，親日色彩太濃，仍然走日本路線」。「就對日關係而言，他已是毫無剩餘價值，不能發生任何作用。」¹⁶⁰反之，受日本教育而不崇日的，他就予以贊揚，對屏東縣長李世昌，就以他受過日本教育「却絲毫未染上崇日的思想，一個澈〔徹〕頭澈〔徹〕尾純潔愛國的青年。」譽之。¹⁶¹也許當時臺灣社會仍存留部分親日色彩，而本、外省人也尚未能消除隔閡，作者才會如此報導。

《台灣風雲人物》中對臺灣人的揶揄之辭，到處可見，很難說卜幼夫不是以高級外省人的口吻來恣意臧否臺灣人，有時令人難以卒讀。如對有「臺灣媽祖」之稱的丘念台，說他「平頂頭，兩眼失神，不算高大的身材，經常穿著一襲中山裝，有健忘症，這像是古稀老人丘念台的輪廓。」¹⁶²對李萬居則稱他「禿頂的法國留學生，似乎已江河日下，逐漸走下坡路了。」¹⁶³說吳三連是「心寬體胖的新官僚，……一躍而為台灣政壇小要人，……吳三連之狡猾，以及不擇手段的行為，自為國民黨所不滿。……他已經變成一個老練

155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45，黃啟瑞。

156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65，彭德。

157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92，蔣渭川。

158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8，李連春。又說他想將米糧輸出日本，交換日本自行車五千輛。

159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7，吳三連。

160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23-125，許丙。

161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4，李世昌。

162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5，丘念台。

163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0，李萬居。

的政客。」¹⁶⁴

對林頂立的評介，除了優點外，說他的「缺點是過分粗魯，勇而無謀。他的左右還缺少老謀深算的智囊。」¹⁶⁵雲林縣長林金生「像一個八面玲瓏的政界能手一樣。」¹⁶⁶對代臺北市長周百煉稱「……迫不及待的以兼代市長身份跨進市府大門來看，我對他表示懷疑。」¹⁶⁷曾任農林廳長的技术官僚徐慶鐘，「窮於應付，昧於社交，加上天生的輕度口吃，因此使人有難以親近之感。」¹⁶⁸形容馬有岳是「台灣光復後崛起的『小要人』。」¹⁶⁹對連震東更是無情的抨擊，說他「漢學一無造詣……妄自尊大，剛愎自用，有失『人和』，以致在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之餘，仍不免於失意。……連氏雖不通經綸，惟做官有術，活動能力極強。……連氏好勝而倔強，縱有『天時』、『地利』之優厚條件，而獨缺『人和』，他在省參議會秘書長任內，自議長、副議長，乃至全體參議員之間，均相處不睦，幾至形同水火，其人緣之壞已到了極點。」¹⁷⁰「既無墨水，又不諳法令，更沒有行政經驗。……」¹⁷⁰對陳逢源稱「小詩人」。¹⁷¹對監察委員陳嵐峰：「監察院一共有五位台省籍的『御史』，他們有共同的優點與缺點，後者最明顯之處便是缺乏口才；包括以家學淵源而著稱的丘老夫子在內，都是拙於言詞的木訥之士。」¹⁷²口才不好，是否和無法說流利的國語有關，有待進一步研究。對「臺灣人第一個鍍金」的黃朝琴，說他有一套「老謀深算八面玲瓏的看家本領。」說他戰後，不過短短18個月，由一個中級公務員平步青雲，成為臺灣的新貴，又成了新興財團領袖；另一方面又是臺灣最高民意的權威，儼然政治領袖之一，「這是極

¹⁶⁴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29-30，吳三連，主要是吳三連原答應倪文亞要加入國民黨才獲得市長提名，但當選後不加入國民黨。

¹⁶⁵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44，林頂立。

¹⁶⁶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59-60，林金生。

¹⁶⁷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66，周百煉。

¹⁶⁸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87，徐慶鐘，甚至說他從未去謝謝提拔他的陳儀，一直到陳儀卸任。

¹⁶⁹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92，馬有岳。

¹⁷⁰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95-98，連震東。

¹⁷¹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00，陳逢源。

¹⁷²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15，陳嵐峰。

不單純的事。」¹⁷³ 上述的描述尤以用「小要人」、「小詩人」來貶損臺人，令人印象深刻。

由《臺灣時人誌》、《臺灣名人集》、《中華民國人事錄》、《南臺灣人物誌》、《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到《台灣風雲人物》這六本人物傳來看，其格式凡例、內容、遣詞用字都有不同之處，由於《臺灣時人誌》，或以中華民國為名的人物傳都以外省人為多，臺灣人受到忽視，因此有臺人自己編的《臺灣名人集》、《南臺灣人物誌》出現，絕非偶然。較晚出版的《台灣風雲人物》則是外省人所編，不但極盡揶揄之能事，在幾個關鍵人物上，也有隨己意臧否之嫌，因此要使用這一帶有偏見的人物志，非得經過考訂、去謬不可。而由此書也可略窺當時外省人對臺灣人物的普遍看法。

三、戰後臺灣人物傳的斷裂書寫

在介紹、分析了有關戰後的人物傳書寫後，本節要探討的是戰後人物傳有那些去奴化、趨祖國化的現象（用黃英哲話語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而呈現那些斷裂。在未進入主題前，必須澄清一些有關的問題，如在處理上述人物傳時，書中有全部為臺灣人的，有日本人、中國人和臺灣人合傳的，我們假設日本人物傳、中國人物傳早已有其書寫傳統，對來臺前的履歷都十分重視；而外省人還特別著重在抗日、反共事蹟，故不必特意去探討，因此將焦點集中在臺灣人傳的書寫；另一個原因是，限於時間，無法將所有的人物傳在一篇論文中討論。

其次，這些人物傳是誰寫的？是誰提供的資料？有些人物傳後有作者或編者的姓名，尚可稍做追蹤，但有些以出版社掛名，就無法了解究竟誰編了這本書。即使掛了名，但資料的來源是主動去收集、採訪，還是由傳主提供也分不清楚，然而這中間卻有很大的差別。如有些不願為外人道的履歷，傳

¹⁷³ 卜少夫，《台灣風雲人物》，頁137-138，黃朝琴。

主可以不自動提供，也可能是編著者主動地判斷該內容不妥或不重要而不予列入。再者，由採訪取得的資料，在完成傳後是否給傳主看過？又因人物志都是為生人寫的，生人也許會干涉到撰述的內容，因而這些人物傳可能都有屈筆，自不待言，但是人物傳中一定要陳述的，或一定不要列入的，大致上都符合當代的需求，則是顯而易見的。以下先探討日治、戰後人物傳各自的特色，再看看以今日所寫的人物傳，是否有因政治問題而斷裂的現象。

（一）日治時期人物傳的特色：

1.就編寫的方式

(1)人選：以地方名望家、士紳、工商業者、官員為主，在人數上並沒有一定的限制，提到女性的不多，以林進發的書開其端，臺灣新民報社、興南新聞報社所編的《臺灣人士鑑》踵繼其後，而使個別、少數的女性得以被視為「人物」，以醫生為多。

(2)盡可能加上照片：人、相並列，可以如見其人，對人物志的實用性大大提高，《臺灣列紳傳》中，臺人士紳穿西服的如鳳毛麟角，大半的人還是臺灣式的衣服、禮服照片最多；掛上勳章（大半是紳章）的《人文薈萃》一書，是遠藤照相館所出版。人物照片相當可貴，而以板橋林家的人物領銜，可見大正年間仍視板橋林家為全臺灣第一家。林進發的《臺灣人物評》、新高新報的《臺灣紳士名錄》、1943年版的《臺灣人士鑑》則未附照片。

(3)編排原則與內容：早期為日、臺人分別為內、臺人處理，到後來則合併處理，但日人編或林進發編的，都以イロハ二順編排，只有《臺灣人士鑑》以五十音順編排。一般目次有五十音順、イロハ二順，和地方州廳別兩種，使翻查較為容易。使用的年代都用日本紀元，但《臺灣列紳傳》獨將獲紳章的臺灣人之清代經歷用清朝紀元，甚至用永曆而不用康熙。

2.就實質內容

以臺灣人編、且是當時臺灣人唯一喉舌報的《臺灣人士鑑》(1934)為例，其內容會載明日本領臺時臺人的協助事蹟，如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辜顯榮的傳，就提到他在5月皇軍(日軍)領臺當時，到基隆去歡迎，以此而出頭。又奉樺山總督之命隨軍南征，11月和民政長官水野遵到京師去，後敘勳六等授旭日章，明治31年(1898)得到紳章，期間任保良局長和保安總局長。¹⁷⁴獲得紳章也是人物傳重要的紀事，如臺南人、臺灣總督府評議員陳鴻鳴傳中就記載他在1897年獲紳章，1911年為了普及日語自費設置臺南「國」語研究會，自任會長，為日語的研究而奔走。¹⁷⁵又如基隆人許梓桑，他獲頒紳章，也佩用藍綬褒章，同時為了內臺人融合和社會教化，以改良風俗為急務。在1914年糾合臺灣人創立基隆同風會，又為普及日語而開設「國」語講習所和幼稚園。¹⁷⁶新竹州協議員鄭肇基，參加了1925年大正天皇的銀婚式，時由宮內大臣以其善行而予以表彰。¹⁷⁷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許丙，1919年5月被選為大稻埕同風會評議員，7月任淡水同風會副會長。1921年被推為淡水同風會附屬青年會長，1928年因多年來為殖產興業而盡瘁，在昭和登基的御大典中得到銀杯一組。¹⁷⁸臺灣總督府評議員林熊徵1913年任帝國在鄉軍人會臺灣支部名譽會員，1915年愛國婦人會贈他金色有功章。¹⁷⁹臺中市協議會員，亦為櫟社一員的林耀亭，曾任縣社臺中神社崇拜者總代。¹⁸⁰即使是林獻堂，雖然在傳中已不書寫他在1905年得紳章，¹⁸¹但在傳中仍有20歲因盡力於公益事業，因而為佩帶紺綬褒章者。¹⁸²隨著日本對中國、東南亞的侵略，《臺灣人士鑑》對臺人在滿洲國、汪政權、華北政務委員¹⁸³任職也已記載，

174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45，辜顯榮。

175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125，陳鴻鳴。

176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37，許梓桑。

177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144，鄭肇基。

178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40，許丙。

179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231，林熊徵。

180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232，林耀亭。

181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5)，頁51，林獻堂。

182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1934)，頁213，林獻堂。

183 1940年3月30日汪政權在南京成立，宣稱還都。1937年12月14日成立於中南海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設華北行政委員會(包括議政、行政、司法三委員會)，以王克敏為委員長，總轄河

如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政治經濟科，曾任職臺灣新民報社的謝廉清，於1937年到天津，不久擔任北京新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商工科長，又累升至畜產司長。¹⁸⁴又如史明之父林濟川，畢業於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他到廈門任汪政權廈門特別市政府公賣局長。¹⁸⁵又如曾任臺灣民報社臺南、臺中支局長，1935年任社會部長，1937年任廈門支局長的郭發，他在1943年任職於廈門居留民團會計審查委員、廈門商業學校設立委員、廈門日本青年團評議員、廈門神社氏子總代等要職。¹⁸⁶

皇民奉公會於1941年4月19日成立，這是呼應成立於1940年10月「大政翼贊會」（舉日本國一致為戰爭效力）的組織，在人員的配置上，網羅民間各個階層的人士，其組織系統和行政機關相同，除在總督府設中央本部外，各州、廳、市、街、郡、庄均設支部與分會，由各地方官兼職。換言之，只要是中央、地方人物莫不被任命為皇民奉公會的一員，因此臺人成為皇民奉公會成員的不少，當時被視為正職、榮譽職，因此是個人重要的職位，在人物傳上詳實記載了擔任皇民奉公會職務的經歷，以《臺灣新民報》專務取締役兼編輯、已改名為林貞六的林呈祿，他在皇民奉公會一成立即任參與，6月擔任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1942年8月改任文化部長。¹⁸⁷他擔任的職務位階相當高，林過去在《臺灣新民報》的同事羅萬俤，亦在皇民奉公會成立即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奉公委員、臺中州支部參與，為皇民奉公運動盡瘁。

¹⁸⁸不要說是林、羅，就是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他也奉命擔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與，¹⁸⁹並到中部地區去演講，主題是如何對國家協力。¹⁹⁰

北、河南、山西、山東四省，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在汪政權成立後，表面屬汪政權，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實際上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統制之下。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北京：該系，1999），頁437。

¹⁸⁴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94，謝廉清。

¹⁸⁵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55，林濟川。

¹⁸⁶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84，郭發。

¹⁸⁷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325，林呈祿。

¹⁸⁸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32，羅萬俤。

¹⁸⁹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54，林獻堂。

¹⁹⁰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年6月），頁186。其演講內容不外是如何配合政府做精神武裝。

1943年的《臺灣人士鑑》除了提供參與皇民奉公會的重要訊息外，也將改姓名的人一一依新姓名的五十音順排列；又怕讀者不清楚，在改姓名下附註原名。一些過去從事民族運動者也改了姓名，如律師蔡式毅，改名為桂式毅；首任臺灣新民報社臺南、臺中支局主任的何景寮改名河本耕治；臺灣新民報社新竹支局長李澤璜改名里澤史朗；在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社任高雄、屏東支局長的林衡權改名林克信；臺灣新民報社記者林夔龍（時任霧峰鄉長）改名為林孝祐。¹⁹¹

由以上之例，即可知日治時期的人物傳，其內容是向日本政府傾斜的相關事實，合於做日本國民的身份，因此被充分的記載。這些理所當然、擦之不去的紀錄，在戰後，政治環境不同之下，自然會有一番改變。

（二）戰後中國化的人物傳

戰後臺灣人面對政權的轉換，尤其是過去的「敵國」，忽然變成「祖國」這一險峻的情況，人們自然要讓不適合另一世代的親日相關經歷消失於履歷中；但相反地，曾經「抗日」或戰後盡力配合政府的事蹟，或加入國民黨及其所屬機構的經歷，做為表忠象徵的這些履歷，就會浮現出來。反之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有關的事蹟，則只披露少許站在政府立場的相關人物傳中。以下由幾個方面來觀察。

1. 編寫方式

《臺灣時人誌》（第一集）是目前所見戰後最早編的人物志，這本人物志可以和1943年《臺灣人士鑑》做一比較。在人選上，《臺灣人士鑑》收錄3,872人，其中日人2,285人（約占六成），臺人1,584人，外省籍人士有3人。《臺灣時人誌》共1,003人，臺籍506人，外省籍487人，外國籍10人。《臺灣時人誌》將《臺灣人士鑑》中的日本人排除，理所當然，但原夠得上資格列傳

¹⁹¹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88、102、178、324、329。

的臺人1,584人中卻只剩下506人，共差1,078人，臺人的人物傳少了2/3。再仔細分析這506人中，兩書都有的臺人只有120人，換言之《臺灣人士鑑》中1,584名臺人中，只有120人被採用，另有將近400個新臺灣人物產生。臺人入傳者急遽降低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項因素，如（1）1943-1947年間亡故者，即不符合人物誌入選的要求，如歐清石、郭廷俊、林熊徵等人，（2）本書聲稱為第一集，編者準備出第二集，因而待補充者不少，（3）編者徵集的人物資料有限，且收錄人物傳並無一定的標準（如本文前面已敘及，將自己的妻小、小舅子都列入）。（4）有些人沒有被列入，背後有政治原因，如死於二二八事件的吳金鍊、阮朝日、吳鴻麒，或因參加臺灣獨立事件或二二八事件，而予排除，如許丙、林熊祥、辜振甫、莊孟侯；還有些因被漢奸審判、或滯留海外尚未歸臺者亦不列入，如林濟川、莊泗川、吳三連等人。至於是否有未收之事，則難以預料；此外半山人物的放入，多少也排擠了阿海（非半山的本省人）的人物傳。

由於由外省人來編的人物志，有傾向多編外省人的趨勢，無以盡載臺灣的菁英，因此本地人乃自行編輯以臺灣人物為主的《臺灣名人集》、《臺灣名人傳》。或許是臺人和新來的外省人仍有鴻溝，拿不到、採集不到外省人的資料，因此才以臺灣人物為重點，也有可能。

在年代的使用上，自然是奉正朔，亦即完全揚棄日治紀元，而改用臺灣人完全不熟習的「民國前」；此外對舊名稱常會用新的稱呼替代，如滿洲國時期的新京醫科大學會被改稱為長春醫科大學。¹⁹²

¹⁹²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22，王洛，說他任國立長春大學醫學教授兼院長，應是新京醫科大學。

2. 在內容方面

(1) 描述抗日事蹟、思想以為彰顯

戰後臺人的人物傳中，半山的傳充滿他們為了抗日而到中國，在中國如何努力抗日，回臺灣後又如何協助國民黨政府的事蹟，自是不在話下，¹⁹³臺人在日治後期被日人誣為私通中國的事件，更是記載的重點，前已述及以李建興傳為例，他的傳不僅說明1940年5月27日他被其雇用的周天生陷害，被日人羅織為「支那間諜」案，以致親友百人被逮，並判12年，三弟建炎、長婿黃奕淮與員工等共20人，慘遭迫害而死，其父亦因此而鬱憤而逝。戰後李氏兄弟在臺北縣瑞芳鎮瑞芳戲院，將其受害的故事全搬上舞臺，各自扮演受害的角色，觀眾感動流淚，轟動一時。戰後於1946年參加光復致敬團到西安祭黃陵並為代表。¹⁹⁴又如高雄聞人王天賞的傳，描述王氏個性剛直誠實，敢作敢為，富有國家民族觀念，日據時代係民眾黨黨員，¹⁹⁵對於民族解放運動尤其熱血，與革命先進林獻堂、蔣渭水等均為抗日同志，對於啟發臺灣同胞民族意識之貢獻至鉅。他任高雄市會議員時，力主正義，不受任何威脅利誘，極力反對日本對臺灣之「皇民政策」，被日本高等警察列為串通祖國之民族主義抗日份子，被捕下獄達一年之久〔旗後事件〕，獄中，其積憤情緒，嘗賦於詩詞之中，直至抗戰勝利始獲釋放，其威武不屈，忠勇為國之愛國精神，尤足稱道。¹⁹⁶但對王天賞於二二八事件後被囚，則無一語及之。¹⁹⁷

¹⁹³ 與《臺灣名人傳》中的王民寧、丘念台、李萬居、陳嵐峰、陳尚文、黃國書、黃啟顯、游彌堅、劉啟光、謝掙強等人的傳相同。

¹⁹⁴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21-22，李建興、頁23李建和；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39李建興、頁60李建和。李建和傳亦有「民國二十九年，先生長兄李建興先生漫遊國內各地，回臺後引起當時震動全島之「五二七」事件，日本軍閥大興冤獄，株連羅織，先生昆仲五人及親友重要員工數十人均遭縲絏，遽加以「私通重慶軍事領袖」之罪名，備嘗五木。昆仲均被判徒刑十二年、七年、五年不等，直至臺灣光復，始克重觀天日。」

¹⁹⁵ 事實上由《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篇，有關資料，未見其曾加入臺灣民眾黨的資料，見河原功編，《臺灣社會運動史〈人名索引〉》，《成蹊論叢》，第27號別刷，1988年，頁28-29、34。

¹⁹⁶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5-6，王天賞。

¹⁹⁷ 王天賞曾在1946年7月任《國聲報》發行人，1947年2月間開董事會時，被策動驅逐，不到幾天因二二八事件發生，報社發行號外，觸怒當局，他因曾任國聲報社長，被關了61天。照史（林

在日治時期任職教師（叭哩沙公學校訓導、宜蘭內員山分校教諭、大洲校長），而後辭職任宜蘭青年團長、宜蘭信用組合專務理事、宜蘭街協議會員、宜蘭會議員的甘阿炎，¹⁹⁸在戰後的傳有如下的描述「當時，甘氏雖辱居於異族統治之下，乃能以慷慨激昂之愛國心情，暗中以民族思想，灌輸門弟，使千百學子均能體會異邦奴役之悲哀，而堅定其愛國意志。」¹⁹⁹再如醫生吳鴻森，後期不僅是皇民奉公會的要員，還是挺身隊隊長，²⁰⁰戰後的傳描寫他父親在中壢自設漢學書房，廣收子弟，傳授國學，有時候還在夜間召集門徒，偷偷講解三民主義和國父革命的情形。而吳鴻森「受著家庭教育的陶冶，幼小時就依戀祖國」。²⁰¹新庄人林世南，戰爭後期任臺北州會議員、新庄郡物產信購販利組合長，戰後被派為新庄郡守。²⁰²對於其日治時期與日本鬥爭的敘述，可在《臺灣名人傳》中窺見：

當時他鑒於日本軍閥橫行無道，日本當局施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奴化臺灣同胞，消滅我國文化，心中憤怒異常，乃不顧日本軍閥之殘暴，艱苦協和同道與日本鬥爭，險遭無妄之禍，其愛國表現及不屈不撓之勇敢精神，深為世人贊揚。²⁰³

(2)去除有關皇民奉公會改姓名相關資料，甚至日治時期的經歷。

以黃純青為例，他在皇民奉公會期間擔任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奉公委員，²⁰⁴但《臺灣時人誌》無一語及之。²⁰⁵黃純青子黃逢時，日治時曾任皇民

曙光），《高雄人物述評》（高雄：春暉出版社，1983），頁101，〈苦學成功者—王天賞〉。

198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02，甘阿炎。

199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1943），頁8-9，甘阿炎。

20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38，吳鴻森。任皇民奉公會新竹州支部參與，同中壢郡支會生活部長、臺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中壢郡分團長、中壢挺身隊長。

201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29，吳鴻森。

202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57-458，林世南。

203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56，林世南。

204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54-155，黃純青。他曾面見1923年來臺的皇太子，又有勳六等，曾參加皇紀2600年的式典。

205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頁220，黃純青。戰前最後一個職位為臺灣新民報社相談役。

奉公會臺北市支部奉公委員，²⁰⁶戰後其傳，完全不說其曾任鶯歌庄長、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市宮前町區長，自然更不會說他任職過皇民奉公會。²⁰⁷畢業於明治大學法學部，擔任組合長、經商的朱漢耀，他在日治時期曾任皇民奉公會鳳山郡支會參與、皇民奉公會高雄州支部奉公委員、鳳山街商業奉公團理事，²⁰⁸但戰後的傳完全沒有日治時期的事蹟。²⁰⁹戰後先任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籌備委員的林猶龍，日治時期的傳十分詳細，曾任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奉公委員、臺中州大屯郡支會生活部長，²¹⁰但戰後的《臺灣時人誌》中，對日治的經歷僅短短五行。²¹¹

(3)盡量顯示去大陸抗日或去大陸活動的事蹟

半山的傳必提上述事蹟，但準半山（即有中國經驗，但非在重慶者）的海外活動，只要不是到偽政權去任官，沒有被漢奸審判的可能，亦盡量留下其大陸經驗。如邱鴻祥，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法科，畢業後即到北京任燕京製紙株式會社事務課課長。²¹²李增禮在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到華北任華北開發公司副參事。²¹³林權敏，北平淪陷後留在該地任軍委會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組長，他早期即到中國，曾任冀察戰區第十一軍上校團長，以後在山西省警官學校當教官，繼則從事實業，任北京福大煤礦公司總經理。²¹⁴張漢戊，1938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英法科，之後赴新京，服務於新京工科學大學及柞蠶公司，共8年。²¹⁵

(4)戰後的黨職或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學習的事實，亦是傳記的重點。

²⁰⁶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59，黃逢時。

²⁰⁷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頁136，黃逢時。

²⁰⁸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194-195，朱漢耀。

²⁰⁹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頁18，朱漢耀。

²¹⁰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1943），頁463，林猶龍。

²¹¹ 章子惠，《臺灣時人誌》，頁59，林猶龍。

²¹²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18，邱鴻祥。

²¹³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27，李增禮。

²¹⁴ 吳巍等編，《南臺灣人物誌》，頁101，林權敏。

²¹⁵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71，張漢戊。

如不願在異族奴化教育的統治下受教育，以輟學做為反抗的陳金買，而後就職於臺灣鐵路局時，即「秘密進行工運，不遺餘力」，戰後續任，並迭有升遷，而任鐵路工會理事及鐵路局反共抗俄自衛總隊臺北機廠防護中隊長，故在1952年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第20期受訓。²¹⁶屏東人陳崑崙，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到戰後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²¹⁷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陳俊樓，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14期結業，²¹⁸畢業於基隆水產學校的陳騰飛也畢業於革命實踐研究院10期。²¹⁹

（三）戰後人物傳的實與虛

以上所述的各種人物傳，都是未過世的人的前傳，他應該有權決定自己生平中那段「不重要」或「不妥當」而不寫入傳的權利。由於尚未蓋棺論定，且礙於傳主可以看見傳的出版，因此編者雖有比傳主更豐富的資料，也得配合而不書寫；即使有所評介，也大半在肯定其過去的作為。在以上介紹的人物傳中，只有《台灣風雲人物》一書例外。這些傳主不願提供，或編、作者發掘不到的史料，往往是與政治有關的資料，如戰後必將在偽政權的事蹟、改姓名、被派擔任皇民奉公會各項職務，甚至接受日本勳章、紳章、勳位、面見皇太子、參加皇紀2600年式典、協助日軍領臺的事蹟刪除，這是因為戰後情勢丕變，原來的敵國「中國」，竟變成祖國，傳主不得不如此。傳中不但要消極地忘卻日治的作為，還要努力嵌合新的情勢，因此在傳中敘述日治時期抗日、學漢文、赴祖國留學、寫出祖籍，就似乎愈能取得祖國的諒解，當然若能在第一時間加入國民黨，也等於有一張護身符。²²⁰

如今情勢顯然已有所改變，臺灣歷經解嚴、本土化運動，人們似乎已漸漸走出政治的恐懼中，此時正是可以回歸先人完整歷史、奪回我們歷史解釋

²¹⁶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84，陳金買。

²¹⁷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85，陳崑崙。

²¹⁸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287，陳俊樓。

²¹⁹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人事錄》，頁305，陳騰飛。

²²⁰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頁93。

權的時候。以往日治時期有在「偽政權」就職的經驗者，往往視當時的作為必須遮掩，以免遭到漢奸審判（或戰犯審判），以致於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經驗，到現在為止仍然有資料不足之虞。個人認為未解嚴時期或許隱瞞有其道理，但在目前來說，如何正視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處境，而不以非到重慶不足以效忠祖國為唯一視角，才能像林進發等編者挖掘出臺灣人海外活動的諸面相。以下我以謝文達、吳敦禮、陳錫卿三人做為例子來說明。

1. 謝文達

有關謝文達的傳，以黃信彰在《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一書中，所搜的資料最全，所寫的生平最細，寫到他因1923年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東京請願時，由空中洒下20萬張宣傳單，將他本可在迎接裕仁皇太子來臺時擔任迎賓的工作弄丟，且迫其投入其父謝春池（在新京）處，而後宣佈退出日本飛行界。再於1925年10月21日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加入河南國民二軍航空隊，服務中國空軍前後八年，後在1930年奉命駕機執行偵察任務時，因故迫降敵軍陣地，而為張發奎所縛。當時國民軍統帥蔣介石發給其二千元獎金。戰後他回臺任省議會專門委員達17年之久，也曾擔任臺北大橋頭的臺灣機械製造廠總經理。²²¹但是令人充滿疑問的是，1930年到1945年間謝文達做了什麼？他好像從人間蒸發了，又，他受日本政府打壓的情況究竟如何？他如何受傷？

據其子謝東漢的解釋，其父謝文達，除了力挺文化協會的請願活動外，還回臺參加文化協會演講，遂被田健治郎總督召至官邸訓示。回日後他又和蔣渭水、連溫卿等人發起「社會問題研究會」，且在日本左翼雜誌為臺灣佃農鳴不平，因之無法進入日本民航界，乃在中國西北軍系的國民軍派來日本

²²¹ 黃信彰，《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頁22-52。由高麗鳳總編輯的謝文達傳，說他在1930年6月率中央飛行隊往廣西征討桂軍，因機器故障而摔成重傷，遂為張發奎軍捕獲；蔣介石派人到漢口慰問，並致贈二萬元慰問金。由於傷重，二年後始痊癒。1936年3月在周至柔將軍請長假的情況下，申請除役（上段結束後，就直接談1945年回臺）。見高麗鳳，《臺北人物誌》第二冊（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頁82。

士官學校留學的人之慫恿下，宣布退出飛行界，轉往河南。不久到廣東國民革命軍廣州航空學校任飛行教官。1928年北伐完成後航空隊改為空軍，1929年任空軍新編第六大隊隊長，1930年因編選問題引發了中原大戰，7月在湖南作戰，飛機為炮火擊中，墜機汨羅江，身負重傷，遂調到南京明故宮基地任作戰參謀，後任職航委會。在中國經歷九一八、一二八、熱察之役、塘沽協定後，仇日氛圍漸濃，他雖改歸中華民國籍，仍因臺灣人的身分，在忠誠度上受到藍衣社的懷疑，1936年感到處境險惡乃移居上海租界。²²²

由上可知謝被視為左翼，且忠誠度被懷疑，這樣的經歷不能見容於戰後。其次，謝東漢說他父親在1936年避居到上海租界，難道就在那裏當寓公直到戰後嗎？顯然不是。日本人於1937年12月攻下南京後，成立由梁鴻志領導的維新政府，這時謝文達任其諮議，中國人稱這種現象叫做「落水當漢奸」。汪政權成立後，他在1940年起任汪精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高級參謀，1941年轉任中華航空公司理事兼上海支社副社長，²²³一直到日本戰敗。這段進入維新、汪政權的經歷，且又擔任軍職，在戰後是絕對不能提，因而有關這方面的資歷就開了天窗。這段史實，在2006年年輕的學者為他作傳時，這兩段經歷仍未補起來，我寧可相信是資料不足，而不是將這段歷史認為是上不了臺面，而予以忽略。

2. 陳錫卿

陳錫卿，字錕鋁，南投人，1933年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治科畢業。²²⁴他在1947年參加臺灣區第一屆縣長考試榮獲第二名，奉派為彰化市長，前

²²² 謝東漢，〈懷念吳敦禮伯伯〉，吳燕美女士提供，謹致謝意。按謝東漢為謝文達之子，謝、吳兩家熟識，兩人同在汪政權服務，吳燕美為吳敦禮的次女。謝東漢為謝文達之獨子，對在南京的臺灣人知之甚詳，亦曾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來接受我的訪問。

²²³ 滿蒙資料協會，《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華資料協會，1942），頁869；不著編人，《華北政府職員錄》（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3），頁348。此書為本人在瀋陽的遼寧省立圖書館找到的，但只剩半本。封面加上牛皮紙，寫著《偽華北政府職員錄》，當時能找到此書為該館臺籍館員吳利薇女士的協助，謹致謝意。謝文達在南京航空協會服務，則見於清水無縫，〈謝文達飛行士〉，《臺灣時報》，1943年7月，頁60。

²²⁴ 臺大同學會編印，《臺大畢業同學錄》，頁1。

後兩年。1950年11月彰化市與原屬臺中縣之二十五鄉鎮合併成立彰化縣，他奉派為縣長，前後4個月。1951年縣市長民選，一屆4年，他前後當選彰化縣長三次，連任12年，由於任內大力推動建設，因而被稱為「建設縣長」。任滿，升臺灣省政府委員兼臺灣省民政廳廳長，前後7年（1960-1967）。1967年調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兼中國電視公司、臺灣土地開發公司常務董事。1970年任齊魯公司董事長兼臺灣省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以省政府顧問、行政院顧問退休。²²⁵不過在他的事蹟中，仍缺乏他在1933年10月畢業於滿洲國大同學院的經歷。²²⁶

如果我們看陳錫卿過世後，家屬為他所寫的〈陳錫卿先生事略〉可知，他在1933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後一直到1946年都沒有就職，只是「二十七歲時與許碧梧女士結婚，夫人慈惠孝淑，德容兼備，於治家教子之劬勞，對先生豐功偉業之襄助，均功不可沒。」²²⁷讀者見此事略一定會有疑問，1933-1945年長達13年的時間，陳錫卿所為何事。1993年我在進行「日據時期臺灣人的大陸經驗」口述歷史訪問時，有幸訪問了陳錫卿夫人許碧梧女士，在我請求下，提供其夫的簡歷。原來陳錫卿在1934年到滿洲國去，擔任文教部專門委員，兩年半後改任安東省文教科視學官兩年半；之後任北安省文教科長1年半，最後調回文教部任職，半年後退休。1938年，到上海擔任汪政權上海市政府周佛海機要秘書8年，「負責與日本復興部畑俊六司令官交換糧食配給給上海市民之聯絡官。」²²⁸上述在滿洲國和汪政權的履歷是否正確？《滿華職員錄》中有陳錫卿在滿洲國任民生部事務官，在汪政權上海特別市政府專員，²²⁹可為上述的履歷做腳注。

由上我們看到和謝文達相似的例子，在其過世的傳記（訃聞）中，主動將中華民國認定為偽政權的資歷由生平中去除，即使已到蓋棺，仍不敢敘

²²⁵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3輯（新店：該館，1995），頁320-322。

²²⁶ 米澤久子編，《大同學院同窗會名簿》（東京：大同學院同窗會，1998），頁23。

²²⁷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3輯，頁320-322。陳錫卿逝世於1985年。

²²⁸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1995年），頁267。

²²⁹ 滿蒙資料協會，《滿華職員錄》，頁45、913。

明。1993年，家屬才出示陳錫卿在上述政權的相關經驗，莫怪1956年出版的《臺灣名人傳》，對陳錫卿這段經歷以經商來做掩飾：

中日戰爭期中，陳氏因憤於日本軍閥之橫野，乃採取不合作態度，邁返祖國大陸經商。²³⁰

幸得薛化元在《臺灣歷史辭典》中為陳錫卿做傳時，已有如下雖不足，但正確的敘述：

中日戰爭爆發，陳錫卿赴「滿洲國」任公職，後轉往南京〔上海〕，為周佛海秘書。²³¹

3. 吳敦禮

第三個要舉的例子是吳敦禮。他在日治時期修纂的相關人物志，尤其是三個年代的《臺灣人士鑑》都未見其傳記。戰後最早出現的政治活動是1949年欲競選臨時臺灣省議會議員卻落選時開始。²³²其傳最早出現於《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對其戰後到1956年投入帽蓆業、植物油、麵粉業的業績有所敘述。²³³此外也任職南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煉鐵、大甲製糖有限公司、新興獸疫血清股份有限公司等常務董事及竹南油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²³⁴至於在日治時期的經歷為何？他是大甲人，1905年出生，「民國十一年卒業於臺灣商工學校後，毅然歸國入廈門集美高中，後升入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力求深造。畢業後又東渡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大學院，專攻國際政治與外交史，造詣甚深。曾先後著有『國民政府外交政

²³⁰ 商業新聞社，《臺灣名人傳》，頁112。

²³¹ 薛化元，〈陳錫卿〉，收於許雪姬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2005），頁859。

²³² 吳燕美，〈我的舅舅〉，收入《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頁816。

²³³ 丁滌生，《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頁54，吳敦禮。

²³⁴ 吳燕美，〈我的舅舅〉，收入《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下冊，頁816。

策』及『日本幕末外交』諸書，頗為世人所重。」²³⁵

和謝文達、陳錫卿一樣，也就是他1932年大學院畢業後，到日本投降，這14年間，他做了什麼？如果參閱《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一書有關吳敦禮的小傳時即可知，他的前半生其實是外交官。先是1932年畢業後即被國民政府外交部延攬為亞洲司編譯員，1934年派赴巴拿馬總領事館任領事（一度代理總領事館務），而後調回外交部，在情報司辦事。1937年12月中旬，由王克敏領導的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行政部外務局科長。當1940年汪精衛「還都」南京，仍稱國民政府，他續任行政委員會外務局長，兼國立新民學院教授。²³⁶不過該《人物總鑑》出版於1940年，因此往後5年的事蹟無法交代。筆者也一直在努力找這段失去的履歷，因而曾訪問過其表弟郭清海，據他說汪精衛曾任外交部長，吳敦禮是他的舊屬下，因此「還都」後，乃派他到菲律賓領事館出任總領事一職，1941年汪政權與日本加強關係，因此10月乃派任汪政權駐日本橫濱總領事，²³⁷到1942年10月才離任。回南京後離開外交部，而到北京大學擔任東亞外交史的客座教授。但我一直找不到相關記載，直到我看到《華北職員錄》時才恍然大悟，我比對「吳克竣」和「吳敦禮」的事蹟，原來吳在「落水」後用的名字是吳克竣，方知他確實在1941年11月任「在橫濱中華民國總領事館總領事」，前後一年半，這段期間還著有《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東亞情勢概論》。²³⁸

由於曾在臨時政府、汪政權擔任過外交事務，為了隱藏這段事實，連在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的事蹟也一併隱瞞下來，讓人以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商人。以他當時所任的官職及任教新民學院，戰後定會遭漢奸審判，我們看苗栗苑裡人吳左金在1945年終戰時任滿洲國駐汪政權的濟南總領事，戰後被捕

²³⁵ 不著編人，《華北政府職員錄》，頁183。

²³⁶ 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頁139。

²³⁷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郭清海先生訪問紀錄〉，1995年3月15日於臺中大甲鎮郭宅，未刊稿。

²³⁸ 不著編人，《華北政府職員錄》，頁183。但駐菲律賓總領事的資料尚未查到。

判刑一年。²³⁹即使非以此事實判刑，他任新民學院²⁴⁰教授，也會和柯政和、江文也等臺籍人士一樣遭到逮捕。²⁴¹他之所以安然無事，戰後還到北京大學擔任東亞外交史客座教授，一直到1946年回臺，應該拜改名所賜。

至於吳敦禮何以沒有隨國民政府去重慶？乃因吳敦禮奉命撤往重慶時，這時已有4個小孩，妻子又有孕在身，家屬不能同往，乃決定逃到香港。後經朋友勸誘欲赴南洋，但因妻子猶豫難決，乃做去南洋及北平的籤，抽中北平後決定去北平。先到北京大學教書，再到南京外交部任職。²⁴²

以上三個例子，讓我們了解到臺灣人在中國大陸，只要不是追隨國民政府到重慶，而在「汪偽」或「偽滿」任職的臺灣人，都怕被漢奸審判而隱匿這段事蹟，造成履歷的空白；其實他們在偽政權下討生活，除了在滿洲國的臺灣人能堂而皇之稱臺灣人外，其他的臺灣人都要用中國的籍貫，以免暴露臺灣人的身份而遭到猜忌。以《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所收錄的臺灣人物來看江文也，福建廈門人；吳主惠，福建福州人；²⁴³吳敦禮，福建同安人；柯政和，福建安溪人；洪樾（炎秋），福建同安人；洪耀勳，福建漳州人；張深切，福建龍溪人；張錫祺，福建惠安人；郭柏川，福建人；顏春安，福建思明人，幾乎沒有例外。²⁴⁴由中也可知在中國抗日的氛圍下，臺灣人是日本籍，即使改為中華民國國籍，也會被猜疑，就可知道臺灣人成為中、日兩國的邊緣人，他的國籍是流動的，冒籍情非得已。

本節指出日治時期、戰後臺灣人物傳中的諸多面相和特質，由於當時都

²³⁹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1995年），頁115-116。

²⁴⁰ 新民學院為日本特務部組織的新民會所設，該會有人稱之為「奴化教育團體」，也有人認為是無所不入、無所不包的龐雜而反動的組織。

²⁴¹ 許雪姬，〈1937至1949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2008年4月），頁56-57。

²⁴² 吳燕美摘錄編補，〈吳燕生寫吳敦禮〉，由吳燕美於2009年6月書寫、提供，謹致謝意。吳燕生為吳敦禮長子。

²⁴³ 吳主惠，臺灣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40年在日本巢鴨高等商業學校擔任中國語教師，編著有《日華實用辭典》，由東京求文堂出版。此外還有《華語文法研究》、《華語常用單字急速略記法》、《現代日語會話》等。

²⁴⁴ 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頁109江文也；頁126吳主惠；頁139吳敦禮；頁291柯政和；頁302洪樾（炎秋）；頁302洪耀勳；頁415張深切；頁432張錫祺；頁481郭柏川；頁778-779顏春安。

是為生人立傳，因而提供資料的本人，或編者，都會隱匿某些活著的傳主不願看到的資料，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目前我們再為這些人立傳時，必須注意各個時代因政治因素可能闕漏或誇大的事蹟，盡量予以補充、訂正，方是正途。然而如果我們看目前修訂的傳，真的令人有點失望，如2007年《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一書中謝文達的傳仍缺少1937-1945年的事蹟；2001年《竹山鎮志》中的陳錫卿傳，在他長達10幾年的履歷空缺中，只以不到10個字交待「學成，不得志，赴大陸東北謀職。」²⁴⁵而《大甲鎮志》對吳敦禮在汪政權的履歷依然不提。在他畢業於東京帝大大學院後，僅記載：「曾任北平大學教授、農工銀行經理等職務，民國35年返臺經營大甲帽蓆事業。」²⁴⁶如何有系統地研究臺灣人物傳所要表現的正面、背面的意義，正有待於我們補破網。

四、結論

本文藉由介紹戰後不同版本的人物志（非死亡者的傳）所顯示的意涵，來了解人物傳中的斷裂現象。先大致介紹日治時期臺灣人物傳有官修如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有私修如遠藤照相館的《人文薈萃》、有日人編者如大園市藏、有臺人編者如林進發，有報社為主體所編纂，如臺南新報的《南部臺灣紳士錄》、臺灣新民報的《臺灣人士鑑》（1934、1937、1943）、新高新報的《臺灣紳士名錄》，這些人物傳中的臺灣人，都會被列入一些和統治者日本政府協力、獲賞的事蹟，如協助日本領臺、平定「匪亂」，獲紳章、褒章、勳位，參加觀菊、觀櫻會、皇紀2600年式典、擔任同風會、國（日）語講習會、皇民奉公會的職務。這些現象，在戰後「去奴化」²⁴⁷政策下，有

²⁴⁵ 陳哲三總編纂，《竹山鎮志》（竹山：該鎮，2001），頁1436。

²⁴⁶ 廖瑞銘，《大甲鎮志》（臺中：大甲鎮公所，2009），頁1567-1568。吳敦禮原名墩禮。

²⁴⁷ 以奴化來形容日治時期臺灣人所受的日本化，不要說范壽康教育處處長公開的發言指出，往後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受刑書也往往有如下的說法，如〈42審三字第0015號〉「被告張棟材在日據時代受奴化教育，對民主政治社會缺少認識。」又如〈42安度字第0289號〉「被告邱丕祥素在東北受日據時代奴化教育，對民主社會政治少有認識。」後者是安東省莊河縣人。這種對

所謂「漢奸總檢舉」，²⁴⁸又有逮捕參加「臺灣獨立事件」者，²⁴⁹又進一步要褫奪曾任皇民奉公會高級人員的公職，²⁵⁰一如日本的「公職追放」，可以說有皇民奉公會經歷者，戰後成為臺灣菁英普遍避諱的話題。²⁵¹文學家張文環，曾擔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大屯郡支會霧峰分會主事，他在戰後絕口不提，似乎曾任奉公會的職位使他「有某些節操上可疑」、「並曾因為這些往事遭到質疑和難堪」。²⁵²而臺灣人在日治時期隨著日人的腳步前往中國、東南亞、滿洲國的人，戰後得面對漢奸、戰犯審判，如曾在臺灣民眾黨活躍過的彭華英，²⁵³曾被視為臺共、文協左翼的成員莊泗川。²⁵⁴因此除了去重慶對國民政府効忠的臺人，只要在「汪偽」、「偽滿」任職的，都惴惴不安，將其相關資歷刪除，自是意料中的事。

戰後的人物志，沒有公家編的，有私人、也有雜誌社編的，但總體而言，其特點都是刪除與日本有關的事蹟，只除了抗日事蹟，有些難以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三編找到實際參加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者，在傳中也會加入其抗日的思想和不願被奴化的事蹟，尤有甚者將其赴中國大陸全部視

在割讓地區臺灣、淪陷區東北，受日本教育的都稱被「奴化」。

- ²⁴⁸ 1946年1月17日臺灣警備總部公佈舉行漢奸總檢舉，到1月31日止，收到約300件的檢舉信函，見大公報，民國35年1月19日；《臺灣年鑑》(6)(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頁2025，民國35年1月31日。
- ²⁴⁹ 1946年2月21日辜振甫等10人被捕，另外100名也在逮捕名單中，見〈灌園先生日記〉，1946年2月21日；丘念台，《嶺海微風》(臺北：中華日報叢書，1976再版)，頁251。
- ²⁵⁰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年6月)，頁185。
- ²⁵¹ 如林衡道就指出有一年邁的漢文記者，原是日治時期皇民奉公會的積極分子，他告訴某立法委員，說他在日據時期每天以淚洗面。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頁76。此種說法，正所以要掩蓋其任過皇民奉公會的經歷。
- ²⁵² 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頁518。
- ²⁵³ 013.81/4212，民國35年(1946)~36年(1947)12月，〈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藏國防部史政編譯處，現已移轉國家檔案局，〈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5.11.6)〉。他的判決書指出：「被告曾任偽職，並未指出其他犯罪證據，則該被告既為日本人民，當有盡忠國家之義務」之判決內容。
- ²⁵⁴ 許雪姬訪問、黃美滋紀錄，〈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集暨口述歷史紀錄》(臺北：該會，2003)，頁162。他向法院辯訴「被告生為日本籍民乃是被逼，不是自願，是余在母胞已決定，……被告謹以敵國人民回歸祖國人民的身份，懇求審判長，上體蔣委員長對日本所施的以德報怨，下恤本世紀淪為日本奴隸的臺胞，賜予無罪判決。」

為「抗日」的表徵，有的甚至不出現日治時期的相關履歷，如我在第四節所舉的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三個例子，避免惹禍上身。除了抗日事蹟外，在籍貫上出現「祖籍」似為加強與祖國的紐帶，此外寫上黨職，表現出當時以黨治國、黨職的重要性，同時也加上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經歷，以及一些與黨國有關的團體如省黨務訓練班、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等職。

戰後人物傳除有上述特質外，也可看出在臺灣，不論何時出版的人物志，都有兩群履歷相當不同的人，日治時期的日本人固然有工商業人士，但大半入傳的都是總督府、州廳官僚，其與臺人的經歷有很大的落差。戰後來自中國的外省人士，在傳中充滿抗日、剿匪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人選大半是來到臺灣上千人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以及中央、省、地方的官僚，同編在一本人物傳中顯得格格不入，因而日本人的編者採取，先日本人再臺灣人的做法；而戰後外省和本省的編者則從未如此劃分，但因以「中華民國」為名的人物傳中，外省人占絕大多數，因而有臺灣人出面編《臺灣名人集》、《臺灣名人傳》、《南臺灣人物誌》，前兩本幾乎全部是臺灣人，後者則只包括在基層的數位外省人，如擔任縣市長、警察局長、水利會長。其中有二本由外省人編的人物志為例外，一為章子惠編的《臺灣時人誌》第一輯，一本是卜幼夫編輯的《台灣風雲人物》，前者1,003人的傳中，臺灣人約佔一半，而這506人和《臺灣人士鑑》（1943）比較，只有120人相同，亦即戰後臺籍士紳忽然「變少」了，除了正常、非正常（二二八事件）的傷亡外，將與二二八事件、獨立事件有關的人物，或判刑的人物排除在外，加上一些新人物而成。卜幼夫對67個臺人的描述，對臺灣人的容貌、語言能力等，都有負面的描述，對吳三連等人以「小要人」貶之，令人覺得他的採訪不是為了突顯臺灣人物在反共復國上的貢獻，而摻雜了揶揄臺人的成分，善意的猜測是為提高銷售量的手法。

不論戰前、戰後，傳中都盡量附照片，在書寫上格式化，也慢慢增加了女性的篇幅，就上述這些人物傳，雖然都不長，不足以將傳主涉足的事件本

末完全表達，但透過對人物傳逐一的研讀，能充分體會編者、傳主所能表現出的時代氛圍。目前由於資訊發達，「臺灣當代人物誌」資料庫容易使用，且有4萬筆以上的資料，搜羅包括人士鑑、月旦評、地方大觀、學經歷傳、期刊雜誌，可以解決資料零散收集不易的困難。另外的優點是「解決傳略與經歷難以兩全的遺憾」、「解決人士鑑版本眾多難以比對的困擾」，但是本文要指出的是，今日我們研究人物，不能只用資料庫的人物做比對，以取得「正確」的資訊，而是需要了解不同時代、不同編者的人物傳中的特色，並利用其他資料加以考訂，並了解戰後去奴化（去日本化）下某些人的履歷有空白的部分，如何補全才是當務之急。臺灣人物相關資料不僅在臺灣人物傳、中華民國人物傳中出現，如《滿華職員錄》、《華北政府職員錄》，甚至在《中國文化人物總鑑》都有。近一、二十年來臺灣新編地方志書，其人物傳既不採訪也只利用資料庫中的人物傳資料即完稿，實為可惜。

臺灣人物自有臺灣人物的月旦方式，不能以日治時期臺灣人是日本籍為日本人効力即不見容於戰後。戰後因漢奸罪被逮捕的陳杏村（女），她被控最重要的罪名是「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運動敵方陸軍機關啟封復業，又獲該公司報酬一千萬元，故在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以個人名義向上海陸軍機關捐獻飛機兩架，計值壹百萬元……。」²⁵⁵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長石美瑜等三人，判決為無罪，主要理由是「查被告籍隸臺灣，本屬日本國民身份，縱令獻機、貸款屬實，亦係國民對於國家應盡之義務，雖其行為對敵國軍事不無協助，惟於國際條約、國際公約及國際保證並無違反海牙陸戰規例，亦無處罰規定，核其所為，既不構成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²⁵⁶足以證明臺人在日治時期，身為日本國民為日本國做事，不應被視為漢奸、戰犯，應該除罪化，且不能用上述不忠於中華民國的行為而獲罪，事屬顯然。

²⁵⁵ 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陳杏村，〈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起訴書〉（二）證據及所犯法條，民國36年1月11日，藏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

²⁵⁶ 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陳杏村，〈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五號，中華民國36年5月14日。

因此臺人在日人泡製的傀儡機關任職，國府的軍事法庭並未重判。有關日治時期臺人到「汪偽」、「偽滿」工作的事蹟應以平常心視之，應和到重慶活動的臺灣人之事蹟，同樣受到重視，才能逐一展開跨越兩個時代臺灣人的研究。

（責任校對：郎咏恩）

引用書目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檔號B-07-0001〈臺省國大卷〉，黃漢夫致李懷祖電。

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起訴書〉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

檔案管理局（藏）

國防部軍法局，〈42審三字第0015號〉，《張棟材等叛亂案》，檔號0042/3132304/304/1/001。

國防部軍務局，〈42安度字第0284號〉，《非法顛覆案》，檔號0039/1571.3/1111/35/034。

檔案號013.81/4212，民國35年（1946）4月～36年（1947）12月，〈彭華英等戰犯審理案〉，原藏國防部史政編譯處，現移轉國家檔案局，〈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35.11.6）〉。

1981 《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

丁瑞鈇

1986 《懷恩感舊錄》。臺北：自刊本。

丁滌生

1957 《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臺北：世界文化服務社。

卜幼夫

1962 《臺灣風雲人物》。臺北：新聞天地社。

不著編人

1943 《華北政府職員錄》。不明出版地、社。

中華民國人事錄編纂委員會

1953 《中華民國人事錄》。臺北：中國科學公司。

王克文

1999 〈人物傳記與近代史研究〉，《近代史學會通訊》5：39-51。

丘念台

1976 《嶺海微飆》。臺北：中華日報叢書。

米澤久子（編）

1998 《大同學院同窗會名簿》。東京：大同學院同窗會。

吳燕美

2007 〈我的舅舅〉，收入黃英哲、許時嘉編譯，許雪姬、楊宗義審訂，《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下冊，頁816-818。臺北：國史館。

吳燕美（提供）、謝東漢（撰）

〈懷念吳敦禮伯伯〉。未刊稿

吳燕美（摘錄編補）

2009 〈吳燕生寫吳敦禮〉，由吳燕美於2009年6月書寫、提供。未刊稿。

吳巍

1956 《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

呂紹理

1998 《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

杜家驥

1997 〈歷史人物傳記的史料價值〉，《歷史月刊》115：32-38。

杜聰明

1973 《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河原功編

1988 《臺灣社會運動史〈人名索引〉》，《成蹊論叢》，第27號別刷。

侯坤宏、許進發

2002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國家安全局、臺灣省諮議會檔案》。臺北：國史館。

柳書琴

2009 《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聯經出版社。

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著）、張君玫（譯）

- 2001 《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臺北：巨流出版社。
商業新聞社
- 1953 《臺灣名人傳》。臺北：商業新聞社。
國史館（編）
- 1995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3輯。新店：國史館。
清水無縫
- 1943 〈謝文達飛行士〉，《臺灣時報》：60。
章子惠
- 1947 《臺灣時人誌》第一集。臺北：國光出版社。
許雪姬
- 1996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67-211。
- 2007 〈評《臺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收入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277-301。臺北：麥田出版社。
- 2008 〈1937至1949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56-57。
-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
- 1995 〈郭清海先生訪問紀錄〉，1995年3月15日訪於臺中大甲鎮郭宅，未刊稿。
-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
- 1995 〈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95-120。
- 許雪姬（訪問）、黃美滋（紀錄）
- 2003 〈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收於《「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頁130-230。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
- 1995 〈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247-268。
-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
- 2002 〈陳登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

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219-230。

許雪姬（訪問、紀錄）

2004 〈林恩威先生訪問紀錄〉，2004年1月8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稿。

許雪姬（策劃）

2005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社。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

1992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哲三（總編纂）

2001 《竹山鎮志》。竹山：竹山鎮。

黃玉齋（主編）

2001 《臺灣年鑑》（6）。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黃信彰

2007 《臺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黃師樵

1999 《臺灣共產黨秘史》。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新臺灣出版社編輯室

1953 《臺灣名人集》第一集。臺北：新臺灣出版社。

楊焄治（補記）

1947年3月13日以後〈吳鴻麒日記〉。

照史（林曙光）

1983 〈苦學成功者—王天賞〉，收於照史，《高雄人物述評》。高雄：春暉出版社。

廖振富

2009 〈百年風騷，誰主浮沉？二十世紀臺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之對照觀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205-248。

廖瑞銘

2009 《大甲鎮志》。臺中：大甲鎮公所。

滿蒙資料協會

1942 《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華資料協會。

臺大同學會（編印）

1952 《臺大畢業同學錄》。臺北：臺大同學會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印）

1946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

194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單位及臺北市各公共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4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趙爾巽、柯劭忞等（編）

1981 《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

鄭麗玲、楊麗祝

2009 《臺北工業生的回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橋川時雄

1940 《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羅久蓉（訪問、紀錄）

2005 《姜允中女士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羅久蓉（訪問）、丘慧君（紀錄）

2005 《萬國道德會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嚴秀峰女士（提供）

〈臺灣時人誌人事調查表〉。未刊稿。

鷹取田一郎

1915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The Writing of De-Enslave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Nationalization:
Take Post-War Biographies in Taiwan as an Example

Hsueh-chi H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post-war biographies written after World War II, such as Taiwanese Contemporary Biographies (1947), Biograph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Celebrities (1953), Biographies of Taiwanese Celebritie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Southern Taiwan (1957). It discusses the contents about de-enslave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nationalization in these texts. For example, these biographies delete the history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in Kominhokokai (皇民奉公會) eternally. Instead, they described the patriotic events during the Japanese reign and the post-war phase. In addition, some characters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uppet regimes are also deleted from these texts, so there is a gap in post-war Taiwanese biographies. The instances of Xie Wen-da, Chen Xi-qing, and Wu Dun-li are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the above phenomenon.

Based on above issues, how to interpret existing Taiwanese biographies and how to value these Taiwanese are serious problems for the modern research of Taiwan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evaluation should not depend on Japanese or Chinese texts. We should have our own standpoint. Those Taiwanese working for the puppet regime during the Japanese reign should accept as much attention as those Taiwanese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at Chongqing.

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
——以戰後臺灣人物傳為例

Keywords: evaluation of Taiwanese, Xie Wen-da, Chen Xi-qing, Wu Dun-li

